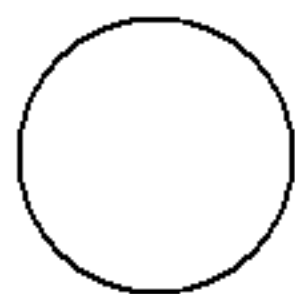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二年 9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二年第九期 目 录

抓紧路线教育 认真看书学习

要善于进行比较安 群 (3)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洪 城 (8)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学习《国家与革命》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海南地区委员会副书记 李子元 (12)

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指针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金 灿 (18)

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养路

.....辽宁新金县公路管理段金山养路道班 (24)

从实际出发 向群众学习

.....湖南慈利县长峪铺大队党支部书记 黄炳秀 (32)



总结实践经验 搞好教育革命

怎样使学员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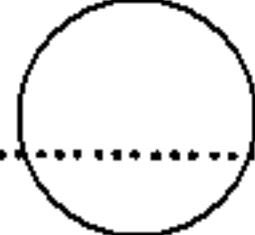
形象化教学与培养科学抽象能力

——基础理论课改革的一点体会大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 (41)

根据工人学员的特点组织理论教学

.....中国共产党上海机床厂委员会 (46)

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 (51)

切实做好厂校挂钩 裴 玉 (55)

发挥“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上海市吴淞中学党支部 (58)

小评论一组(六篇) (61)

影评: 拍摄更多更好的科教影片方 亮 (70)

杂文: 在“反酗酒”的背后阳 戈 (75)

☆ 九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语录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抓紧路线教育 认真看书学习

要善于进行比较

安群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我们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中，在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比较方法，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育，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一个传统方法。毛主席在《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里指出：“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多年来，我党在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教育中，采用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比较的方法，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

忆苦思甜，回忆对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比较法。我们都还记得，在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就是通过对自已亲身经历的新旧生活的鲜明对比，启发了阶级觉悟，认识了革命真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武装斗争。正是通过回忆对比的教育，他们深深懂得为什么而战斗，为谁而战斗，因而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立场坚定，勇往直前，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经常忆苦思甜，回忆对比，使广大革命群众从亲身经历的变化中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



对资本主义道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也使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年青一代，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懂得应该怎样保卫和建设得来不易的社会主义江山，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忆苦思甜，回忆对比，还有效地帮助了少数忘了本的阶级兄弟幡然醒悟，重新振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自觉地克服缺点和错误，回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为革命立新功。

在进行正面教育的同时，接触反面材料，研究反面教员，进行正面和反面的比较，展开对立面的斗争，这又是一种我们常常使用的比较方法。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党在历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总是在着重地引导革命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把反面的东西公之于众，让群众通过比较、鉴别，自己动手批谬论，锄毒草，将毒草化为肥料，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例如，在历次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重大斗争中，我们党曾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等反面材料公布在广大群众面前，进行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除发表正面的批判文章外，我们还在报刊上刊登过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谬论，刊登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文章。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和鉴别，结果怎样呢？和阶级敌人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不是他们的谎言欺骗了人民群众，而是人民群众揭穿了他们的画皮；不是由于他们的攻击而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人民群众更加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

抓先进典型，树革命样板，开展表扬和批评，进行先进和后进的比较，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比较方法。例如，我们学习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学习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比较、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自觉地继续革命，不断前进。同样，我们抓住落后的或错误的典型，加以揭露，也是让人们通



过比较、鉴别，更好地发展先进的和正确的东西，克服落后的和错误的东西。

广大群众对比较的方法有丰富的经验，切身的体会，他们用许多生动朴实的语言称赞这种方法，如：“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比看看，好坏自见”，“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比沾沾自喜，一比相差万里”，等等。

科学的比较的方法，为什么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起到这样明显的作用呢？这是因为它是符合人们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对立面。“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就必然有假的、恶的、丑的东西，有革命的、进步的东西，就必然有反动的、落后的东西。比较的方法，就是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通过互相矛盾的对立面的比较，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点，进而用真的、善的、美的去克服假的、恶的、丑的，用革命的、进步的去克服反动的、落后的。因此，科学的比较的方法，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这种比较法也就是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把互相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把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具有很大的鲜明性，谁好谁坏，是真是假，泾渭分明，一清二楚。这样就能使人感奋起来，进而在分析中间，在鉴别中间，在斗争中间，取得比较完全和正确的认识，促使真理战胜谬误，先进克服落后，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通过斗争。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机会主义分子总是用谣言和诡辩来欺骗群众，蛊惑人心。要戳穿这伙骗子的伪装，就必须把谣言和真理拿来对比，把假象和事实拿来对比，以便从他们变幻不定的形象中看清其反动本质，看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使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武器，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所运用，



成为行动的指南。当我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从本质上揭露修正主义观点的谬误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也就深入了一步。经验证明，比较的方法是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好方法，是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好方法。

有的同志在看问题、想问题的时候，并不是正确运用唯物辩证的比较方法，而是把一些表面的、片面的现象拿来作简单的类比，不对事物作深入的分析，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不仅不能使人们认识真理、抛弃谬误，反而会象诡辩术那样，把人们引向邪路。

能不能正确运用比较的方法，这不单纯是一个方法问题，是同我们每个人的立场、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立场、世界观不同，比较的出发点、比较的内容、比较的标准、比较的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社会生活方面最本质的问题。对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要进行阶级分析。要看看这个或那个事物究竟是为哪个阶级、哪条路线服务的？是对哪个阶级、哪条路线有利？譬如说，如何看待战争。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标准进行比较，就会笼统地认为，战争的双方，都是使用武器造成人的死伤，都是不对的，因而不能正确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不能认清战争的实质。又譬如，如何看待所谓自由、民主。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和标准加以比较，就会被一些假象所蒙蔽，就会看不清问题的本质。但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阶级分析，就很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只不过是他们随心所欲地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他们的“民主”只不过是用皮鞭和刺刀强迫人民服从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享有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因此，不能抽象地谈论自由、民主，而要弄清究竟是哪个阶级享有的自由、民主。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的功利标准，就会越比越糊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为我们规定了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



条，这样，“**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从这里深刻启示我们，对事物进行比较、鉴别的时候，掌握正确的标准是很重要的，只有牢牢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标准，才能比较、鉴别事物的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促成事物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

再拿革命同志之间的比较来说，同谁比、怎样比、为什么比，这里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有一个正确的比较内容与比较标准的问题。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要求，比是为了学先进，超先进，促后进，帮后进，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这正是唯物辩证的比较方法。因此，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同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思想比，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比，同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比。这样，才能比出差距，比出干劲，比出方向；才能通过比较，克服我们思想肌体上有害的东西，树立起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这样的比较，是积极的，有益于人民，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比较方法。譬如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么比，就会使自己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甘居中游，满足现状，右倾保守，其结果，中游也是保不住的，往往造成落伍掉队。“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这么比，不仅比不出客观真理，而且会蒙蔽自己的眼睛，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当作豆腐渣，就会摆错个人同党、同群众的位置，甚至会在政治上造成严重的恶果。这种比，都是一些主观唯心论的比较方法，因而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相反，却会引导人们一步步陷入错误的泥坑。至于同别人比职位、比待遇、比享受，这种“比”，更是消极的，可鄙的。这种“比”，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它对革命队伍起着腐蚀瓦解的作用，对革命团结起着破坏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

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比较方法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让我们遵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运用唯物辩证的比较方法，来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吧。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洪 城

保持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是深入开展批修整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是批修整风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政治本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和修正主义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主席曾经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辩证关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执行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这是为我国几十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真理。我党我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始终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党和军队来说，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到抗美援朝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战胜了千难万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苦奋斗又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保证，是我们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巨大力量。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自力更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毛主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光明大道。但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艰苦斗



争。保持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就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战胜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抵制各种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干扰，达到胜利的目的。如果丢掉艰苦奋斗的作风，一碰到艰难困苦，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党和人民所交给的斗争任务。

在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坚持不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全国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迫使敌人不得不采取更加隐蔽、更加狡猾的手法向我们进攻，其中大量的、经常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利用旧时代遗留下的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作风来腐蚀革命队伍，妄图从生活领域打开缺口，达到政治上解除武装的目的。这种腐蚀与反腐败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谁如果丧失革命警惕，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能使我们不仅不为资产阶级所腐蚀，而且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种进攻遭到失败。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自觉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朝气蓬勃，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继续革命，深受群众的爱戴和赞扬。但是，也有少数同志在新形势下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工作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以及个人职位的变化，不愿意再过艰苦奋斗的生活。这是需要注意警惕和克服的。

在胜利和成绩的面前，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胜利与成绩从来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既看到斗争后的巨大胜利，又看到胜利后的严重斗争；既看到成绩和进步的一面，又看到缺点和不足的一面。而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人，则往往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自我陶醉于一时之胜。

毛主席曾经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学习和时局》）有了胜利和成绩，这是好事，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就会成为自己的包袱和负担。一旦被胜利冲昏头脑，被成绩蒙住眼睛，在大好形势面前停步不前，在赞扬声中忘乎所以，滋长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情绪，这就使好事转化为坏事了。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胜利和成绩。这样，才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绩，都是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要恰当地估计自己的作用，正确认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战斗中，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只是革命海洋



中的一滴水。我们在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只是整个革命胜利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我们在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总是有限的，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的。我们所做的贡献，是应尽的革命义务，决不能居功自恃，把成绩记在自己的账上。

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都是任重而道远的。每一个胜利和成绩，只能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新起点，决不能把万里长征走完了的第一步当成了最后的一步，把革命长剧中的序幕当成了终结的尾声，更不能以它作为换取享受的资本。毛主席指出：“**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我们应该把胜利和成绩当作动力，不断激励自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争取更大的胜利，创造更大的成绩。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干部的职位变化比较大，因为革命的需要，有的走上了新的领导工作岗位，有的由不担任领导工作而担任了领导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防止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一个领导干部，要做到职位变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永不变，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时刻想到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样，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的职位变化。职务有所不同，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我们的干部，决不能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而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为革命艰苦奋斗一生。

时刻想到是为人民服务——这样，我们的职务越高，就越能想到为人民应尽的义务越多；我们的职权越大，就越能想到为人民担负的责任越重。随着职位的变化，不应是追求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应是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更大的提高，业务上更加迅速的熟悉，使自己进一步适应于党和革命的需要。职位，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权，这是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党和人民给自己领导工作的权力和条件，作为个人图享受、谋私利的方便。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干部，应当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时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这对于领导干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尤为重要。如果因为职位一变，不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共同奋斗。任何领导干部只有心中时刻装着群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



能真正代表群众，更好地领导群众。我们的一切干部，凡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也都是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不图虚名、不闹地位、不搞特殊的好干部，无论职位怎么变化，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才是难能可贵的。正如毛主席在讲到一个人要一辈子做好事时指出的：“**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难就难在这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树立起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把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最大乐趣，就会焕发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自觉艰苦奋斗一辈子。不认真改造世界观，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就只能在困难时期“熬”一阵子，在短时期内“挺”一阵子。因此，要把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过程，作为认真改造世界观的过程，自觉地做到胜利面前不松劲，职位高了不特殊，成绩大了不停步，生活好了不忘本，朝气蓬勃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要树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保持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自觉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使我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刻理解保持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重要意义，把对艰苦奋斗的一些朴素认识变为高度自觉的认识，从根本上划清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同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的界限，分清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高尚精神，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卑鄙思想。要通过看书学习，联系思想实际，严于解剖自己。我们应当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勇于向自己头脑中的骄傲自满、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刀。要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同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实行彻底决裂。

革命的精神，来自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艰苦奋斗的革命实践中来的。只要我们坚持和广大群众一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改造主观世界，自觉地在艰苦环境中磨练革命意志，洗刷唯心精神，打掉“官”、“暮”、“骄”、“娇”四气，就能不断焕发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党和国家的广大干部，我们军队的广大指战员，在艰苦奋斗方面一向是做得好的。在今后的斗争中，只有继续做艰苦奋斗的榜样，才能坚持继续革命，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学习《国家与革命》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海南地区委员会副書記 李子元

伟大导师列宁一九一七年写的《国家与革命》，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它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思想武器。我在批修整风运动中，重新学习这一著作，联系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加强基层建设；同时，要认真看书学习，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狠抓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核心。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为了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并“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不承认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我在学习《国家与革命》时，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认识到，毛主席提出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它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



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路线。我们必须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我从一九六九年到海南以来，主要是抓农村方面的工作。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村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尖锐的复杂的，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对待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采取什么态度：是拥护和巩固集体经济，还是反对和破坏集体经济？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不断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还是允许在集体经济内部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把集体经济引向邪路？在这里，阶级敌人亲自出马、赤膊上阵的也有，但更多的是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来进行破坏。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总是要寻找机会妄图瓦解集体经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合法”的手段，挂着“集体”招牌，进行资本主义活动。这在集体经济的生产方针、种植计划、产品销售、收益分配、经营管理、副业生产以及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都经常表现出来。此外，在海南的少数地区，还夹杂着封建宗族的斗争。

我们体会到，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一著作中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发展而变化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是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的物质力量。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必须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的斗争。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削弱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阶级敌人对集体经济的进攻，总是先制造舆论，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进行腐蚀，收买拉拢，从政治上思想上搅乱人心。我们决不能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斗争截然分开。解放以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每隔几年就要向无产阶级作一次大的较量，牛鬼蛇神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每一次的进攻，从根本上说，就是妄图搞垮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抓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伟大纲领。我们的实践一再证明，凡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得到壮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背离了毛主席的指示，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琼海县烟塘公社，前几年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农业生产发展较慢，粮食亩产量一直停留在五、六百斤之间。去年，由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落实党的政策，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社农业生产大踏步前进，粮食亩产量从六百多斤一跃跨过千斤，为国家提供的粮食从常年二百六十万斤增加到五百一十多万斤，林、牧、副业也有很大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得到巩固。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新情况，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这样，才能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

列宁指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列宁在《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又说：“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我抓住这个观点，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逐步弄清一个道理：夺取政权要靠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样要靠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从学习《国家与革命》中使我们了解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考茨基鼓吹“议会道路”，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武装夺取政权；考茨基还宣扬“纯粹民主”，胡说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可以保持无产阶级的统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批判了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胜利地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革命路线，取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全面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苏联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就告诉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到海南工作不久，便到琼海县蹲点。当时对于无产阶级政权要靠正确的路线来巩固，不很明确。一九七〇年，琼海县的粮食减产较大。造成减产可以有各种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县的领导成员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同志正确地看出了问题，认为主要是领导成员路线觉悟不高，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少数同志却认为主要是生产安排得不恰当。我吸取了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这两种不同看法，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我跟琼海县革委会的同志一起，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统一了认识，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狠打击阶级敌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九七一年琼海县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群众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新的领导班子里仍然存在着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必须用党的基本路线来教育各级领导班子，指导生产斗争，才能取得革命和生产的双丰收。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群众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我们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路线觉悟，建设一个能够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基层领导班子，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从海南地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来看，绝大多数领导成员是好的，其中有一批相当数量的领导成员，路线觉悟较高，能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带领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有少数领导成员，路线觉悟不高，在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中“左”右摇摆，或不敢同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当“老好人”。有的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分散主义严重；有的存在懦夫懒汉思想，无所作为。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往往是通过这些基层干部反映出来的。因此，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他们的路线觉悟，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极为重要。

列宁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在革命队伍



中也会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有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才能抵制阶级敌人的腐蚀、进攻，防止“和平演变”，使我们的农村基层政权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有的地方，一当有的干部犯了错误，就采取简单化的调换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是从路线教育着手，这就不是路线决定一切，而是“班子”决定一切。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组织这些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从犯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路线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一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七，较大幅度地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多种经营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橡胶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在一年多来路线教育的基础上，今年五、六月份，我们又逐级举办干部学习班，开展批修整风，普遍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总结阶级斗争和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通过学习《国家与革命》，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经验**”，总结出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创立并不断发展革命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概括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理论。当时应当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因为还没有这种实践经验。马克思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得出了“**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到了一八七一年，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了用“公社”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通过学习，我深深感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真总结经验**的重要。只有刻苦学习理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正确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我是多年做农村工作的。过去盲目地以为自己有点经验，有跟着毛主席干革



命的热情，学习差一些，也可以过得去，不注意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由于存在这种盲目性，所以常常出现“左”右摇摆。一件新事物出现，开始时总是不理解，思想落后于形势，后来跟了上来，但又容易产生新的盲目性，从这一种倾向转到另一种倾向。

回想到一九六二年，当国内外阶级敌人趁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看不见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埋头抓生产，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生产搞上去解决经济困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党敲起警钟，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头脑才逐步清醒过来。但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开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影响，一度扩大了打击面。象这种“左”右摇摆的现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克服。这是和我存在着经验主义、路线觉悟不高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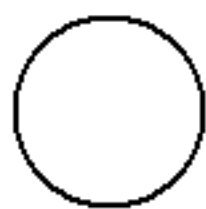
在长期的农村工作中得到一些经验，这本来是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领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有利条件。但是，盲目满足于自己狭小范围的经验，势必眼光短浅，缺乏远见。人贵有自知之明。陷于经验主义的人，缺少的正是自知之明，存在的是思想上的盲目性。凭着经验主义办事，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就会辨不清方向，分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就难免上当受骗。把个人的一时的狭隘经验作为观察事物的依据，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代替全体，其结果必然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毛主席教导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整顿党的作风》）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极力阻挠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我把认真读马、列的书和认真读毛主席的书结合起来，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前的路线斗争结合起来，把学习理论和深入农村“蹲点”、总结经验、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对于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践使我认识到，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路线觉悟，才能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指针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金 灿

一九三六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光辉著作。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强调指导战争的路线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把研究战争规律作为制定战略战术的出发点，坚持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了唯心论的先验论。

毛主席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它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有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臆造。它是战争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决定着战争发展的总趋势，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我们从事革命战争，就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性。不懂得革命战争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一切战争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同一定的作战对象，为了一定的



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战争和战争之间既有相同的情形，又有不同的情形。这种相同的情形，构成了一般战争或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比如进攻和防御是基本的战斗形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作战的目的等，这对于一切战争都是适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种不同的情形，就是一战争区别于另一战争的特殊的矛盾，它构成了这个战争本身的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下进行的，比较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中国革命战争又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规律。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就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们党进入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产生了若干小块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不断受到敌人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当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作战？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即：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红军既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它说明，中国革命战争既有有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我们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都必须从这些特点和规律出发。毛主席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批判地吸收了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的革命战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指导路线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

毛主席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战争，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后发制人，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把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争运动的基本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紧密结合，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攻防交替运用。它通过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主动，迫使敌人由全体上的优势变成劣势，由战略上的进攻变成防御，我即以战略反攻和进攻，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向敌人实施战略追击，直到彻底消灭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作战的方针原则，充分体现了以退为进，以防为攻，化敌为弱，变我为强的革命战争的辩证法。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毛主席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红军处在强敌进攻面前，不是凭借“弱”来打败敌人，而是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自己变成强者，从而战胜敌人。敌我之间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进攻和防御等矛盾着的状态，并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可变的，可以在战争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实现这种转化，决定于指导方针的正确和主观的努力。实行积极防御，就是把防御当作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手段，使我由防御转入反攻和进攻，彻底歼灭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从战略上、全体上看，敌是多兵外线进攻，我是少兵内线防御；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但是，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我采取先诱敌深入，后战略反攻的方针，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打敌一部，再及其余，各个击破。这样，在战役战斗上、局部上，我变成了强者，敌变成了弱者，我主动，敌被动，从而逐步地从整体上改变原来敌强我弱的态势，改变在战略上敌主动、我被动的地位，实现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然后再实施战略反攻，大量歼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毛主席的积极



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不懂得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主张并推行消极防御。“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诬蔑为“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变成了逃跑主义。这样，就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所产生的恶果。

在战略防御中，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即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是我们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必须采取的战略步骤，历来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有效的军事政策。毛主席说：“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诱敌深入，一是有理，二是有利。把敌人放进来，使全国以至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是敌人来进攻我们，不是我们去进攻他们。我们就能广泛动员人民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可以使我军主力相应地集中，进行机动作战，选择有利战场，迫使敌人就范。它可以使敌人忘乎所以，发生错误；分散兵力，背上包袱；疲劳沮丧，到处挨打。这样，敌人的弱点就充分地暴露出来，我们的长处就能充分发挥，怎么打有利就怎么打。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诱敌深入，鼓吹什么“短促突击”，充分说明他们不懂得革命战争，尤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敌人堡垒主义作战方法的进攻面前，畏敌如虎，既不敢实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又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相反地，他们捧着消极防御当宝贝，把兵力分得很散，强使红军在敌人的堡垒前面，构筑工事，对推进筑堡的敌人以短促



的突击，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企图用防御来“顶”住敌人。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单纯防御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军事保守主义。其结果完全使自己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既不能保存自己，也不能消灭敌人，不仅没有打破敌人的进攻，反而被敌人所打破。这种所谓“短促突击”，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其他错误一样，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主席把我军的战略战术高度概括为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在武装革命斗争中的科学创造，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深刻体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同你硬拼，而同你脱离接触。等到我能吃掉你时，就集中三个师、五个师，吃你一个师，吃掉一个，再吃一个，一口一口地把你吃光。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一切战略战役计划，都是建立在打这个基本点上。毛主席指出：“**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打运动战，就能使我主力部队在广阔的战场上，高度地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捕捉有利战机，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毛主席又指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出于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需要，对于某些战略要点和重要阵地的坚守，对于敌人某些设防阵地和据点的攻击，都是应该承认阵地战的。但不是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同等看待。长征途中，由于王明路线的逃跑主义，中央红军受到严重削弱，而又面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处于很困难的境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寻找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渡过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妄图歼灭我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反革命计划，使红军转危为安，为完成震惊中外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是我军作战史上的光辉典范。

恩格斯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是建立在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广泛的群众性。红军的战略战术来源于人民战争的实践，又服务于人民战争，是我党群众路线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是不能利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看不见人民力量，脱离群众，其结果也必然失败。革命战争依靠群众就能胜利，脱离群众就要失败，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也是一切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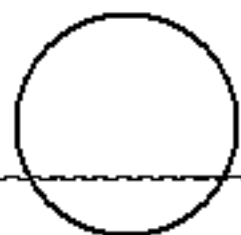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正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判定战争的指导路线是否正确，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看客观社会实践的效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依战略的性质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为第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二阶段，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开始前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是胜利、失败、再胜利的历史。第五次反“围剿”时，机会主义者错误地否定了原来的正确方针，遵义会议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方针，恢复和发展了原来的正确方针。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伟大真理。指导战争的路线正确了，红军就迭挫强敌，击败几倍、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根据地不断扩大。路线错了，即使有了人和枪，仍然会造成根据地和部队的丧失。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中国革命战争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则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产物，违反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实行起来必然失败。

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其他一系列的军事著作，是我们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贯穿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有力武器，也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过去取得胜利，依靠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今后还要靠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掌握毛主席的根本战略思想，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自觉性，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夺取更大的胜利。



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养路

辽宁新金县公路管理段金山养路道班



编者按：这是一篇讲养路工作中的唯物辩证法的文章，写得生动具体，有分析，有认识过程，有总结。我们希望能读到更多的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对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文章。

我们负责养护的是一段砂石路面的山区公路。全段有大小岭坡六座，弯道四十多处，经过七条不同流向的河沟。几年来，我们全班十一名同志，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反复实践，摸索出公路养护的一些规律，战胜了复杂的地理条件和多变的气象给养路带来的各种困难，解决了养路中的一些难题，保证了大小车辆在我们负责的路段上畅通无阻。

“鸡爪沟”的成因是怎样被发现的？

在养路工中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冷不怕，热不怕，就怕大雨哗哗下。”说的是每当大雨过后，那些岭坡路段的路面上，就出现“鸡爪”似的纵横沟。浅的几厘米，深的几十厘米，对路面破坏很大，往往影响通车。每到雨季，我们就得整天围着“鸡爪沟”转，忙得手脚不得闲。刚把一场雨冲出“鸡爪沟”的地方修复，再来一场雨，它又恢复了原状。后来，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例如横着路面挡一些“人字坝”，用来减缓雨水集中冲流，但是问题并没解决，不但照样出“鸡爪沟”，而且水又顺着“人字坝”根冲出一条条横沟。有的同志泄气地说：“谁管得住‘老天爷’？它要下雨有啥法？止不住的雨，断不了的‘鸡爪沟’，什么招儿也不灵！”天要下雨，我们是止不住的，可是，下雨就必然出“鸡爪沟”吗？在大自然面前



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雨水是怎样在坡路上冲出“鸡爪沟”的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吗？毛主席教导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又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决心来一个火线侦察，首先找出“鸡爪沟”形成的原因。

一个大雨哗哗下的早晨，我们带着工具，冒雨来到了我们路段最大的岭坡——石岭大坡。到坡上一看，雨水顺着路面往下直淌，“鸡爪沟”到处皆是。大家顺着路面查着查着，发现形成“鸡爪沟”的地方，地势低、坑凹多，而且那横一条、纵一条正流着水的小沟，都跟一个个水窝窝连通着。接着我们又选择了几个周围还没有形成“鸡爪沟”的水窝窝仔细观察。雨不停地下，水窝窝里的积水由少到多，最后窝满水溢，向四周流去，形成几条小小的水流。这些小小的水流流得时间长了，就将路面冲开一道道小沟，这就是“鸡爪沟”。为了进一步摸准“鸡爪沟”的成因，我们又冒雨到“鸡爪沟”较少的岭坡继续调查。发现这种岭坡的特点是路面拱度适当，平实度强，流水分散。经过两种岭坡的对比调查，得出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坡上与坡下，坡下容易出现“鸡爪沟”；高处与低处，低处容易出“鸡爪沟”；平处与凹处，凹处容易出“鸡爪沟”。总之，路面坑凹不平，高低不一，拱度不适宜，就容易形成“鸡爪沟”。雨水能够在某一段坡路上冲出“鸡爪沟”，关键还在这段路的路面上。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下“什么招儿也不灵”的结论，这是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当。

我们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以下几项制服“鸡爪沟”的措施：一、适当加大岭坡路面的拱度，使雨水比较顺畅均衡地流向两侧，避免积水。二、增强路面平实度，使路面不易形成积水的坑坑凹凹。三、回沙、匀沙，保持路面平坦，不给雨水留下集中冲流的条件。由于我们掌握了“鸡爪沟”的形成规律，就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修补为积极预防，防治结合，使“鸡爪沟”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基本实现了“小雨路面不受损，大雨车辆照常行”。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雨破坏路面，这是一害。过去我们就怕“大雨哗哗下”，现在多日无雨，我们还盼下雨呢！雨天，借雨水容易发现路面上的坑凹，检验平实度；雨天，土又松软容易活动，便于整平路面、扫浆修补。因此，雨对养路又



是一利。如今，我们变“雨闲”为“雨忙”，运用了“三雨”养护方法，即雨前回沙、匀沙；雨中查治；雨后抢修。不但工效高，而且质量好。大家说，学习了唯物辩证法，人就变得心明眼亮，就能使不利变有利，被动变主动，在征服大自然中获得自由，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搓板路”是怎样变平的？

“搓板路”，既象洗衣服用的搓板，又象横在公路上的一些地垄。“垄”与“垄”之间的距离一般都在一尺至一尺半，“垄”沟的深度一般在一、二厘米。汽车在这样的路上跑，颠抖得门窗咣咣响，震得乘客脑袋嗡嗡叫，“搓板”既妨碍车辆顺利通行，又影响车辆时速和使用寿命。修整“搓板路”是养路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

过去，我们对“搓板路”采取了不少修整措施，先是用黄泥和沙子拌合，给“垄”沟贴上“膏药”，可是过些时候一看，贴“膏药”的地方变成了“垄”台，原来的“垄”台却变成了“垄”沟，又起了新“搓板”。这个办法不行，我们就铲“垄”台，结果还是不顶用，铲完当时是平了，过些时候又起了；这里没铲完，那里又起了。这样，时间长了，一提到“搓板路”，有的人就说：“‘搓板路’是蛤蟆不长毛——天生的，没治了。”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有些东西暂时“没治”，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可是有人又说：“即使能治，技术员、工程师早就拿出办法来了。我们摆弄不明白，能想出啥法子？”法子是凭空想出来的吗？不，法子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书本上没有的，通过实践就会有，别人没研究出来的，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摸索出来。

毛主席教导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对立的双方总是依着一定的条件朝相反的方向转化。从没有“搓板”到产生“搓板”，有它一定的条件；只要准确地摸到“搓板路”形成的条件，就能够改变“搓板路”。我们决定到“搓板”严重的一段路进行现场调查。经过几个地方的调查，发现“搓板路”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由一条或几条“垄”逐渐延伸成几十条、几百



条“垄”，致使几十米、几百米，直到几公里的路段成了“搓板路”。这就说明，“搓板路”是先从一点开始的。那么，这一点是怎样开始的呢？我们又进一步观察。一天，我们在观察中，发现一辆行驶着的汽车，被路面上的一个尺把宽的土岗颠了一下，车轮一起一落，把路表沙子挤出个尺把宽的小沙波，很象一条“垄”。接着驶来的几辆汽车也都同样被这土岗颠了一下，不仅使原来形成的“垄”更明显了，而且随着车辆的再次颠簸，又挤出来一条“垄”。这样下去，“垄”逐渐多起来，连成了片。我们还发现汽车遇到坑凹受颠时，车辆一起一落同样起“垄”。这次观察使我们醒悟了：路面不平车受颠，车辆一起一落就是一条“垄”，“垄”连“垄”不就是“搓板”吗！以后，我们多次观察，发现“搓板路”始于一岗、一凹、一包，是路面不平，回沙不匀造成的。

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也翻过一些技术资料，有些资料着重在汽车行驶上，例如车速、载重量等方面找了不少形成“搓板”的原因。可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运输量越来越大。我们养路工人只能养好路，让路适应车，而不能怪车多、车快、车重，不能让车照顾路。光在行车上找原因，不在路上找原因，下气力，那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观点。“搓板”的成因找到了，我们就勤查路，削土岗，除鼓包，填坑凹。对于原来铺装较差，影响路面平实的路段，我们重新搞了铺装；用锹撒碎石铺不平，我们就用手拣，手指磨破了，缠上胶布继续干。我们的态度是：精益求精，向人民负责，宁肯自己多出力、多受累，也不能因工作粗糙而起“搓板”。这样一整，路面平实度提高了，“搓板路”也就大大减少了。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在表面看来很平实的路面，竟然也出现了“搓板”，这是咋回事呢？还是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开了窍。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由单方面看问题转为从多方面看问题了。我们在这种“搓板路”的起点进行解剖分析，路面一破开，就看见里面有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比别处突出，我们叫它“猴头石”。“猴头石”虽然还没有完全突出路面，但路面上这一点对汽车轮胎的反作用力要比其它地方大得多，当轮胎压上了这一点，就象皮球落在石板上一样，使劲弹了一下。弹运的轮胎一落实对路面的压力就格外大了，承受压力的“松散保护层”被车轮挤动，立即就出现沙波，



呈现“地垄”形状。由于车轮继续向前运动，颠簸不能一下子消逝，就象皮球在地上摔了一下，还要跳跃几下子一样，车轮还要继续颠簸。这样，车轮对路面的压力就是一强一弱的，受压强的部位就形成了不明显的“垄”沟，受压弱的部位就形成了不明显的“垄”台。一辆车这样颠几下，再来一辆也同样颠几下，就逐渐形成“搓板路”，而且越延越长。这就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样，一石可能颠起千条“垄”。掌握了这个情况，每当较平实的路面出现“搓板”时，我们就立即破土取石。“猴头石”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影响路面平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何保证路面平实，我们还要从多方面调查研究，不断解决。认识“一次完成论”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路面平实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搓板”了吗？我们说路面平实，只是相对的平实，事实上没有绝对的平实。再平实的路，如果养护跟不上，平实也会变成不平实。我们认为，在基本解决路面平实的问题之后，是不是搞好回沙养护，就成了能不能解决“搓板”的主要原因。原来，我们有的同志不信服这一点，觉得“回沙是‘瞎汉子’活，推推拉拉，三岁孩子也会干。”其实，回沙大有学问。回沙时，厚薄不均，本身就造成起“搓板”的条件。开始是在路表沙子上形成活“搓板”，可是经过车轮碾压，雨淋，一些粉沙就板结变硬，活“搓板”就变成了死“搓板”，那时就不好调理了，真是“一天不回沙，就得三天抓，三天不回沙，再就不好抓。”所以，我们一方面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做到及时回沙，另一方面努力掌握回沙技术，做到回沙均匀。现在，我们养护的路段上基本消灭了“搓板”。

“翻浆道”是怎样根治的？

“翻浆道”多出现于春天，它的表面有二十厘米左右的硬皮，里面尽是泥浆。经过车辆多次重压，就把路面顶起个大包，使路面软软颤颤，严重的地方包破浆溢，泥泞一片。汽车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象船在波浪上颠簸起舞，稍有不慎就要误车，翻车。过去我们了解，结冻前雨水多，第二年道路翻浆就严重。因此一直认为，水是“翻浆道”形成的根源。在防治“翻浆道”时，也总是在排水上打主意，春、秋疏通边沟，不让路边存水；出了“翻浆道”，就采取挖明沟、盲沟、渗水井等渗水措施。这样做，虽然使翻浆程度能减轻一些，却得不到根治。就是说，我



们的措施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的结果。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又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我们的措施所以只能减轻而不能根治，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抓住形成“翻浆道”的根本原因。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决心深入调查研究，努力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翻浆道”的“内部的矛盾性”。一次，在治理和尚屯南岭的一段“翻浆道”时，我们对水是根本原因发生了怀疑，这段路比起下面未出现翻浆的路段高十几米，岭上的水自然少得多，为什么在水少的地方却出现了翻浆呢？以后在治理一段靠河低洼路段的“翻浆道”时，进一步得到启示。这段路一千来米长，而“翻浆”的地方却只有三十多米，其余的地方虽然也是湿漉漉的，但是湿而不懈。为什么同样地下水位的路段，偏偏这三十多米的地方“翻浆”呢？抓住这一现象，我们进行了定点解剖，对“翻浆”的和不“翻浆”的路段土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原来是土质不同。凡是出现“翻浆”的地方，大都是淤泥或“泻涝黄土”。这种土裹水能力强，渗水能力弱，具有海绵一样的特点。这种土在上冻前，都含有大量的水分，上冻后开始膨胀，使路面出现裂纹。春天一化冻这种土就发懈变稀，经车轮挤压，就成了泥浆。这就说明，水是“翻浆道”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只是外因，不是内因，根本原因是土质。

“翻浆道”既然是这样形成的，那么用什么料更换易懈土呢？开始，我们抠出易懈土，换上四十厘米厚的石头。这样，大的翻浆不见了，可是路面还有轻微的龟裂，车走在上面还有颤动。为什么呢？我们又解剖一段进行观察，原来是石头铺薄了，石头下面仍有泥浆出现，汽车一压，泥浆就顺着石头缝挤了上来。后来，我们把石头铺到八十厘米厚，果然，不见翻浆了。当时我们非常高兴，觉得治翻浆有了法子，“‘翻浆道’不用愁，挖出泥浆添石头。”可是，要把整个路段的“翻浆道”根治了，那得用多少石头啊？石头来源困难，成本高。因此我们想找到更好的办法。当地群众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几位老贫农看我们治翻浆，帮我们出主意，说：“盖房子打地基用沙子，就不裹水，不稀溏，很牢固，俺看用沙子治‘翻浆道’能行！”我们觉得老贫农的话说得在理，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几年来我们用了上千个工日，在所有“翻浆道”路面二十厘米以下，换上三十五至四十厘米



厚的沙子。“翻浆道”从此得到了根治。

“马蹄凹”是怎样被制服的？

在我们负责养护的路段上，每天要有三、四百辆畜力车通过。马蹄对路面破坏性很强。马蹄踏上路面开始出“马蹄凹”，凹连凹逐渐形成沟，常常很平坦的路面，几百辆大车过去后，就会在路面上留下一道二、三寸深、一尺多宽的纵沟。尤其雨天，马蹄带起来的泥土，经车轮一压，把路皮弄得象生了癞皮疮似的。过去，我们对“马蹄凹”也用了不少脑筋治理，效果都不太大。我们曾经设想，如果这些大车不走一个“道眼”，马蹄子不单扒一个地方就好了。因此，我们就对赶车的人们说：“你们不能让大车错开辙走吗？”他们笑着回答说：“‘头车是二车的眼，三车四车不用赶’。牲畜是认‘道号’的，你不让它走一个道眼不好使呀！”开始，我们还不信，就要过鞭子赶赶看，真是不假，你刚把牲口赶离“道眼”，它没走几步，就又上了原来的“道眼”，叫大车不走一个“道眼”是行不通的。后来，我们就采取平凹填沟的办法，用黄泥拌石子把纵沟填上。可是，一条纵沟填上不久，两侧又出现了两道纵沟。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分析，原来黄土拌石子的料硬，马蹄子扒不动它，而把两侧的土踏动了，形成了新的纵沟。黄土拌石子料硬，用黄土拌沙子试试行不行，结果也失败了。尤其是秋冬两季，由于路面比较干燥，经过马蹄扒，车轮的碾压，中间突出、两侧低凹的现象更为严重。

平凹填沟的办法失败了。再怎么治呢？毛主席教导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我们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对“马蹄凹”的形成进行了研究。经过观察，我们发现，凡是出现“马蹄凹”的路面，比原来的路面都高。这是什么原因呢？终于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有一天，我们一连观察了上百辆大车的运行情况 and 牲畜蹄落在路面上引起路面的变化，同时对出现“马蹄凹”的地方进行了破土分析。我们发现“马蹄凹”的出现是由于在“松散保护层”与“路面磨损层”之间有一个“粉沙土积层”。这个土层是路表“松散保护层”的沙子久经磨压变成粉末而积成的。它对路面有害无利，马蹄一接触就出现凹。我们又分析，如果让马蹄直接落在坚硬的“路面磨



耗层”上，不就不会出现“马蹄凹”了吗？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把“粉沙土积层”全部清除掉，使马蹄子经过路表“松散保护层”直接落在“路面磨耗层”上。这样“马蹄凹”就果然不见了。当然马蹄扒的时间长了，“路面磨耗层”也会受到一些损伤，但是不至于形成纵沟。只不过是扒破点皮，用黄土拌沙子扫扫浆，填补填补就行了。

养路也同治病一样，治与防得结合起来。在不断清除“粉沙土积层”，撒沙时精选沙料的同时，我们还采取了预防措施，每当一辆辆大车接连通过，形成一个“道眼”的时候，我们不怕麻烦，不顾劳累，一发现就把它扫平，这样，后来的大车就会更换一个“道眼”，马蹄也不至于集中扒在一处，有效地保护了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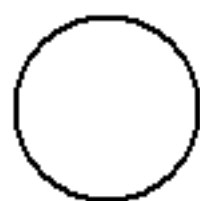
几年来，我们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养路，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矛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使全路段都达到优等路的标准。毛主席哲学思想告诉我们一个认识论的基本道理：实践第一，“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我们正是遵循着这一基本观点，反复调查研究，才掌握了公路养护的一些规律，使路面得到改善的。我们认识养路中的一些规律与解决养路中遇到的难题，是认识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这个统一过程是从实践这个基本点开始的。我们通过实践，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学习，找到了“鸡爪沟”、“搓板路”、“翻浆道”、“马蹄凹”的成因，因此才能拿出解决它们的办法章程，这些办法章程对不对，又要在实践中检验，对了，就把问题解决了，不对，解决不了问题，就得再实践，再认识。刘少奇一类骗子千方百计要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胡说什么“办事情的过程”要“倒过来”，“从主观到客观”，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事实证明，谁想“倒过来”，谁就一定失败。只有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决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我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现在，每天平均从我们路段通过汽车近三百辆次，畜力车近四百辆次，看到各种车辆满载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资安全顺利通过，我们感到幸福和自豪。但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尚未被认识的东西，进一步改进养路工作还有许多新课题，这是决不会“到顶”的。我们决心努力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在实践中继续认识和掌握养路规律，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从实际出发 向群众学习

湖南慈利县长峪铺大队党支部书记 黄炳秀



我们大队历来以旱粮生产为主。过去粮食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们摸索出一条在春收作物间套种玉米、玉米两边间作红薯的“两季三熟”的新路子，使粮食亩产几年来一直超过《纲要》。去年，我们又在“两季三熟”的基础上加种了一季秋玉米，进行“三季四熟”的试验，获得了好收成。我在实践中体会到：世界观和方法论很重要。干工作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实际，头脑清醒，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夺取胜利。

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年中，我队粮食生产老是上不去。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曾有人认为旱粮“是天生的矮子，产量低”，建议我们改地为田种水稻。

要不要改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分析了一下客观情况：从地理位置上看，长峪铺处在海拔一千公尺左右的高山上，全大队一千二百多亩耕地散布在方圆三十华里的“四峪三弯一面坡”上，多是“天水田”；从气候上讲，这里无霜期短，光照不长；论水利条件，水源缺乏。在这种情况下种水稻能高产吗？这要靠实践来检验。我住的杨弯生产队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这个队水田较多。一九六四年，他们一方面把少部分水田，改为种一季早稻、一季秋旱粮；同时，又把大部分旱田，也种上麦子、玉米和红薯，使粮食产量比原来增加两倍。而在第二年，我因看到春天下了一些雨水，便支持他们把所有旱田和装了些水的旱地都种水稻，没留心种旱粮。结果事与愿违，雨水一过，就旱得不行，不仅水稻所收无几，旱粮的产量也降低了。

这个生产队粮食产量的一上一下说明种植作物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使



主观认识合于客观实际。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统统改地为田种水稻，那就会失败。当然也并不是说凡是山区就绝对不能种水稻，或者种水稻就非低产不可，问题是取决于什么样的情况。根据长峪铺的自然条件，既然种水稻一般只能弄到一季，还不稳产；而种旱粮倒比较容易增产，因此我们就决定从客观的条件出发，以旱粮生产为主。

但是，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就等于听任自然摆布呢？不是的。毛主席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实践中认真摸索了旱粮生产的规律。我们发现旱粮的产量并不是“天生的矮子”，拿我们大队来说，有的队低，有的队就高；同一个生产队也存在着地块之间的高、低差别。主要原因在于土壤不同。当时全大队的耕地大部分是“大沙土”，土层又很浅，一下雨就跑土、跑肥、跑水；一干旱作物就枯萎减产，甚至失收。加上又是些小块地，平均每块才七分左右的，很不利于耕种。于是我们就从这个实际问题出发，决定改土造地。可是有的人却说：“大山区不先找水，还能得东西吗？”乍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是脱离了长峪铺当时的实际。当然，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种粮食是需要水的。但是一般来说，旱粮作物的特点是适应性较强，比较耐旱，需水量比水稻少得多。同时就长峪铺的土质土层看，如不采取改土措施，即便有了水，也是难保住的。解决了土的问题，才能保住水，其他增产措施也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从一九六五年冬开始，发动群众改土造地，使原来的“三跑地”，变成了“三保地”（保土、保肥、保水）。近两年来，我们又采取深耕、埋秸秆肥，以及豆麦轮作、粮肥间作等措施，进一步改良了土壤。我们还拿出部分劳力，陆续加固加修了三十四座山塘，有两个较大的水库也即将完工。这样便为旱粮高产打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

我体会到，毛主席教给我们的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是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使主观和客观统一，取得工作胜利的正确途径，是批判唯心论的思想武器。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什么办事情“是从主观到客观”，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妄图把我们引向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泥坑。我们决不要上他们的当。



好主意要从群众中来

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认为向群众学习是大干部的事，自己天天生活在群众中，不存在学不学的问题。由于有这种想法，常常造成头脑空虚，脱离实际。比如，正当我们进行改土治水的时候，一些老贫农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湖区种水稻，一块田一年能收两季，使产量高了又高；旱粮也是粮，为什么就不能一土多用、一年多熟夺高产呢？听了这些，我不仅没去大胆引导，反而问人家：山区能跟湖区比，麻雀不就能赛大雁了？然而群众就是不信邪。一九六六年，长峪铺生产队的一位老贫农就硬把我拉进他们的科研小组，一边改土造地，一边进行麦地里套种玉米、玉米两边间作红薯的试验，实行一年抓两季、一土搞三用。结果三亩二分地，亩产达到了九百四十斤。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为什么我这个讲究实际的人，这回的想法却不符合实际呢？毛主席教导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辩证唯物论讲的实践，就是讲的人民群众的实践。这是人的正确认识的源泉。自己先前之所以能从实际出发考虑长峪铺宜种旱粮，是因为当时个人的想法来自群众的实践；而这次认为“麻雀赛不过大雁”的想法不符合实际，正是由于脱离了群众的实践。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就比较自觉地向群众学习，同贫下中农以及县里派来的农业技术人员一道，取得了旱粮作物“两季三熟”和“三季四熟”的初步经验。从这里我体会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群众”二字。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天才论”，胡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统统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善于向群众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把工作做得更好。

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旧的过程完结了，又开始了新的矛盾运动，又有不少新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去探索。因此，“**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

随着“两季三熟”制的全面推广和“三季四熟”制的初步实施，又出现了劳力紧张等一系列新的矛盾。有一段，我到中心生产队蹲点时，发现这个队推广“两季



“三熟”的工作比较被动，就找队长、会计商量，重新登记劳力，调整各项工种，自己也常在地里“督阵”。我心想，这一来，总算安排得很“科学”了。谁知搞了一段，却不大见效。什么原因呢？我遵照毛主席关于“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教导，通过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找他们座谈，才觉察到又是自己的思想脱离了实际。原来这个队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劳力安排不好，而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地里煽动副业单干，搞得人心不齐。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就和队干部一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紧进行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同时注意解决抓旱粮与抓多种经营的矛盾。由于广大群众提高了路线觉悟，发挥了革命干劲，使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但是，事物是变化的。当人们对某一问题有所认识后，又会出现你还没认识到的问题，等待着人们去再实践、再认识。我在中心生产队克服了自己就劳力抓劳力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后，有段时间又出现了不大过问生产安排和劳力组织等现象。比如一九七〇年订规划时，山边生产队对搞“两季三熟”劲头不大。我想，这准是政治工作薄弱。于是就给他们硬性地规定了一些学习制度，而对这个队耕地较多、劳力较少的实际困难，以及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思想情绪却没过细调查，想得很少。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又没有及时掌握生产环节，科学地安排劳力，这个队那年的亩产量仍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去年，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对山边生产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了具体措施。一方面，将长峪铺生产队把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群众在推广“两季三熟”、“三季四熟”中的思想问题去作、抓住农时到田边地头进行路线教育的经验，拿到山边生产队去推广；另一方面又同他们一起认真地研究每个生产环节上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比较合理地安排了劳动力。这样一来，情况就好转了，既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路线觉悟，激发了为革命而科学种田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有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结果，他们不仅把“三熟”面积在头一年的基础上扩大到五十亩，使亩产跨过了《纲要》，而且还自觉地进行了“三季四熟”的试验。

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世间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办任何一件事情，做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在反复的实践中，不断了解情况，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新形势，以形成正确的意见，制订行之有效的措施，把事情真正办好。

毛主席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常想：为什么自己在实践中往往产生思想上的片面性呢？主要是没有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我决心认真看书学习，自觉斗私批修，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洗刷唯心精神，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总结实践经验 搞好教育革命

怎样使学员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工农兵学员进了大学，怎样才能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这是教学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我们从路线教育入手，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断提高学员为革命刻苦学习的自觉性；采取措施，合理安排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业务学习的时间，同时，在教学改革上抓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按照认识的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 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

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我们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有选择地结合典型产品的生产、科研任务进行教学，实践证明，这是有生命力的新事物。

例如工业自动化系程序控制计算机一年制进修班，配合学习一些基础课程，先组织学员参加一台比较简单的计算机部件安装和局部调整试验，后来又结合专业主要课程《晶体管电路》的理论学习，搞一台较复杂的计算机的总装和调试；当学员通过实践有了专业的感性认识又学了必要的理论以后，就让学员独立完成一台新的程序控制计算机的设计任务。这样的教学安排，效果比较好。有位学员过去是铣工，在参加计算机调试的过程中，碰到由于逻辑设计考虑不周而出现的故障，他也能独立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予以解决。毕业时，这个班大部分人的基



本理论、设计能力和调试技能都掌握得比较好。

但是，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有的班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有个进修班在学员入学后不久，就过早地让他们搞一个又大又全的典型工程设计，由于学员对专业只有局部的感性认识，基本的数学和力学的理论知识也没掌握，只能走一步问一步，发挥不了学习的主动性。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好跟着教员“照猫画虎”抄一遍，结果虽然房子设计出来了，但学员对一些简单结构的力学分析也搞不清。他们反映说：我们虽然有一些实践经验，不向理论方面学习，还是摸不着规律。

这两种做法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克服脱离实际和忽视理论两种片面性，促进理论同实际的统一。列宁教导说：“我们不需要死读硬记，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青年团的任务》）毛主席教导说：“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整顿党的作风》）要按照人们的认识规律，结合实际掌握好基本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再实践；在专一行的基础上适当地把知识面学得宽一些，使学员毕业以后，能够根据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开阔视野，继续学习，不断提高。

为了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学好基本理论，并能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还必须重视科学实验，这是自然科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现场讲课、结合生产的设计作业、形象化教学等，也是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的有效形式。理论课程的某些教学内容有时不能和选定的生产、科研任务等联系起来，如果不采用多种形式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就容易又产生脱离实际、“空对空”地讲理论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我们要加以避免的。

二、废止注入式，引导学员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

教学方法的改革要“废止注入式”，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等一系列指示。



列宁早就尖锐地批判过旧学校“实行强迫纪律，死读硬记”。（《青年团的任务》）是培养书呆子，还是实行启发式，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培养一批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这决不是小事。工农兵学员入学后，一些同志怕有的学员文化程度低一些，不会自学，或怕开展自学后完不成教学进度，甚至认为“多灌多得，少灌少得”，这实际上是对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因此不少班级的教学一度还是“满堂灌”，学员学习被动，有的甚至影响了健康。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些班级的教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努力实践启发的、实验的、研究的、研究的教学方法，积极提倡学员靠自己学。把教材印发给学员，教师只用较少的时间进行启发讲解，其余时间让学员自己研究问题，钻研教材，阅读参考书，还动手做实验，进行社会调查和课堂讨论。这样，教学就搞得比较生动活泼。

例如锻压专业的数学教师在上“导数的应用”一节课时，先拿出一个茶缸问学员：为什么盛水量一样的茶缸，当缸的直径和高度相等时能用料最省？再引导大家把生产中具体的节约原材料问题，抽象成为数学中求最大最小值问题，引起了学员学习的兴趣。接着，指出这一节的重点就在于利用微积分的基本理论来研究数学函数的最大最小值，使学员进一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主动性就发挥出来了。在指导自学的过程中，教师也坚持了启发引导，而不简单地问什么就答什么，把“堂上灌”变成“堂下灌”。这个班的数学课教学方法改革比较早，坚持了七个月，学员在班上学习主动的多，能大胆提出问题的多，讨论时有创见的多，考核成绩优秀的多。原来基础差一些的学员，也开始从被动变主动了。

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在于教员。搞得较好的班级，教师能深入学员，熟悉自己的教育对象，细致地了解他们的文化基础、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并和党支部密切配合做好思想工作，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指导、帮助。例如有的学员自学后抓不住要领，教师就引导他们抓主要矛盾。他们还特别注意培养骨干和典型，例如让自学有体会、进步快的学员介绍经验，组织学习好的学员帮助文化基础较差的学员。这样就要既教书又教人，结合教学做思想工作，并且努力深入实



际，“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三、教材要适合学员自己研究问题

要废止注入式，让学员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就必须有适合于自学的教材。目前我校编写的教材改革得还很不够，也有少数教材编得比较适宜自学。

例如，旧电子学教材往往脱离实际地只讲抽象的理论，当批判了这种倾向以后，有的教材又走向只讲特殊现象，不讲一般原理，只讲公式结论，不讲逻辑推理的另一极端。学员们反映，这种教材不讲道理，“台阶”大，难以自学。新编的《晶体管电路》(上册)注意克服这种特殊和一般脱节的叙述方法，注意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学科领域中去，在一些方面突破了旧教材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体系。旧教材从抽象概念出发，脱离实际需要搞数学推导，在计算实际的晶体管电路时，要引出十几个参数，烦琐难懂。教材编写组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这十几个参数，只有两个在有关专业生产和科研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他并没有实际意义。他们就抓住这两个主要参数，采用了新的计算公式，既能反映事物本质，又便于实际应用。经过总结群众的实践和科学实验，他们还得出了比较适合于生产实践需要的定性分析、定量估算和实验校核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这样就使教材开始做到既好理解又能指导实践。

这本教材比较能够指导实践，是因为编者正视自己“三脱离”的弱点。现在书中的典型电路和例题，有二分之一以上是编者亲身实践过的，四分之一是进行社会调查得来的，不到四分之一引自其他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上，又经过集体的总结讨论，才有可能深入浅出地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本教材比较适合于自学，是因为他们几次邀请学员参加教材的审评，认真总结了教学实践经验。在每章开头都写了内容提要，提出学习的任务、重点和方法，重要章节之后还写了小结，指出各部分内容的相互联系。此外还选编了联系实际的、启发性的思考题、作业题和实验提纲。有一个没有接触过晶体管的学员，自学了交流放大器一章，做了书中的习题以后，到实验室能独立完成多级放大器的设计调整工作，没有上课就



掌握了书中的有关内容。

四、考试也要生动活泼

改革旧的考试方法是改革教学方针和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要从路线上划清新旧考试方法的界限。把学生当作敌人，搞突然袭击的旧的考试方法一定要改革，但不是废除考试，而是采用生动活泼的考试方法：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有些专业进行了考试改革的尝试。如电子计算机专业在脉冲数字电路课中进行的一次考核，是在学员制作的原理线路上，让学员当场排除故障，其中有的故障是教师为了帮助学员掌握好基本理论概念而设置的。这些实际问题，引起学员极大的兴趣，不少学员排除了比较简单的故障以后，还主动要求教师再出几个深入一步的题；有的学员被一些故障难住了，其他学员就提出问题加以启发，或者学员和教师共同讨论，研究解决。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一次生动活泼地、主动地研究问题的过程。

评定成绩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方面引导学员遵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主动地学习。对基本的原理和方法，要提倡运用到实践中去。可控硅装置专业进修班在电子学的考核中，有两个学员自选了功率放大器一题，分析外国资料上的线路，运用基本理论大胆改进，革掉了一个输入变压器和一个输出变压器，减少了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有创见，被评为优秀。这件事鼓励了学员们的创造性。也有个别学员，没有摆脱死读硬记的方法，通过考试暴露了矛盾。教师根据日常的了解，充分肯定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同时实事求是地评定了成绩，并针对问题，帮助他们改进学习方法。

教师与学员反映：这样的考试和评分不仅有助于检查教学，达到总结提高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提倡了创造性，反对了死读硬记的习气；提倡了老实和谦虚的科学态度，反对了不求甚解的作风。使教师与学员通过考核对教和学两个方面作了调查研究，抓住了矛盾，促进了教和学的积极性。



形象化教学与培养科学抽象能力

——基础理论课改革的一点体会

大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

在基础理论课教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遵照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导，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处理好形象化教学与培养学员科学抽象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极力散布唯心论的先验论，百般阻挠基础理论课的改革，致使基础理论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是从定义到定义、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这一套，使学生在学基础理论课时感到玄而又玄，深奥莫测，形成一种“神秘感”和“恐怖感”，极大妨碍了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高等数学就是一个例子。恩格斯说过：“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自然辩证法》）但过去的教材不能反映高等数学中的这种辩证关系。旧高等数学教材一开始总要用很长的篇幅来讲述函数、极限、连续的理论。据有的教材统计，在单元函数的微积分学中，这些概念的论述占了将近三分之一，但是，它们既不揭露函数、极限、连续与微积分的内在联系，不说明学习这些概念的目的，又不指出极限方法的实践来源，而是从定义出发经过推演到定理结束，形成了定义、定理的堆积。这样，就把极限方法这个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得来的理论，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悟性”产物；把原来生动活泼的合乎辩证法的东西，搞得十分枯燥难懂，使微积分成了学生学习上的拦路虎。同时，旧大学里，学生虽然学习了大量的基础理论课，但往往在后续课中不会联系本专业的实际融会贯通地运



用所学基础知识，毕业后不会联系工程技术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基础课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必须加以改革。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开展了对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认识到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理论——实践——理论”的倒行公式，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认识规律。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科学理论并不是科学家脑子里所固有的，而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客观规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它虽然“**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反杜林论》）基础理论课虽然是独立于各专业技术学科的抽象理论，但它也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生产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同其它专业学科相联系的。因此，联系实际学习基础理论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根据“**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的观点，根据工农兵学员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特点，我们在基础理论课教学中，引导学员从感性经验入门，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高，然后再到实践中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即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进行学习。为此，我们开展了形象化教学的一些尝试，也就是在讲基础理论课时，或者用学员所熟悉的生活和生产中的实例以及生动形象的比喻，引出概念，引出问题；或者采用模型教具、表演实验、现场参观等方法，使学员增加某些新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运用概念进一步进行科学理论的推理和论证；或者组织学员深入工厂、工地，**结合本专业情况对生产实践的技术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初步学会应用基础理论。**

由于在基础理论课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形象化教学，把学习直接经验和学习间接经验结合起来，把学习生产实践和学习书本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专业技术和学习基础理论结合起来，使基础理论课教学逐步走向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工农兵学员反映，这样组织基础理论课教学，学习理论的目的性明确，调动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联系了实际，学员对概念、理论的印象鲜明，掌握较牢，既懂得了来源，又学会了运用；教学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学员接受比较容易，理解比较深刻。整个教学过程初步扫除了以往那种死板僵硬的沉闷



空气，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但是，在批判了基础理论课教学中“从理论到理论”的错误后，刘少奇一类骗子又从“左”的方面进行干扰，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破坏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我们有的教员受到这种错误影响，在有的基础理论课中一度忽视了对学生进行科学抽象能力的培养。这主要表现在教材和讲课中讲一般规律和理论分析太少；只讲公式的用法，不讲或少讲公式推导与证明；对重要概念做含糊的解释多，下确切的定义少；讲义中具体文字叙述多，抽象的技术符号少；强调联系专业实际讲，忽视基础理论课的内在系统性和科学性，等等。比如，有的教员在讲理论力学中很重要的平衡方程式时，只是通过一些常见的简单物体平衡作例子，就端出普遍运用的平衡方程式。当时学员看来接受得容易，但由于缺乏方程式本身的严格推导，后来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运用这些平衡方程式时，学员就很困难。这种不注意培养科学抽象能力的做法，使学员往往只懂得特定条件的结论，不懂得普遍规律的实际运用，只记住现成的公式，照葫芦画瓢，而不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于学员缺乏科学抽象和理论分析的能力，不善于独立钻研和自学，就给后续的专业课的学习和毕业后的进一步提高造成困难。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在基础理论课教学改革中，必须处理好形象化教学和培养科学抽象能力之间的关系。形象与抽象的关系，就是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它们是对立的统一。毛主席说：“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此，阐明自然科学的规律，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依赖于形象化的教学，同时又有待于在此基础上的深化，进行科学的抽象，达到理性的认识，方能更深刻地了解自然。形象化教学，对于工农兵学员掌握自然科学的理论起到入门向导的作用。运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形象事例阐明自然科学的理论，能够达到化难为易、豁然开朗的效果。但是，形象化教学并不能代替科学抽象和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形象化教学只能使学员对事物有现象的、外部联系的感性认识；还必须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从感觉到思维，从形象到抽象，



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内部联系的理性认识。那种把形象化教学和培养科学抽象能力互相割裂和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同以理论和实际统一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违背的。

我们坚持科学的抽象，并不是要回到脱离实际的老路上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在形象化教学的基础上，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努力达到革命性与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使学员善于应用基础理论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用气力、下苦功，不然的话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但是，“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如果我们趋易避难，浅尝辄止，不注意培养科学抽象的能力，就不能使学员真正掌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功，不能适应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日益迅速发展的需要。

为了在形象化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科学抽象能力，我们在基础课教学中，注意对于从实践中引出的概念一定要给予严格的科学定义，帮助学员确切地建立科学概念；在讲授基本理论和公式时，不是注入式而是启发式地由浅入深地引导学员进行必要的理论推导和证明，使学员学会科学推理的方法；通过一定数量的作业、实验来反复加深对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与巩固，培养学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出好自学提纲，推荐必要的参考书，帮助学员进行自学，鼓励大家研究问题，使学员善于独立思考；在一门课的教学中或各门课之间，要注意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使学员对基本理论和方法有反复学习、逐步深化的机会。

实践证明，在基础理论课教学中，实现形象化教学和培养科学抽象能力的统一，是工农兵学员更好地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例如：在高等数学中，我们学习了清华大学的经验，首先在概论部分中，通过“一把大锉”等生动事例，通俗地介绍微积分的方法。钳工师傅用平锉一下一下地锉出一个圆形工件来；建筑工人用一块块直的条石砌出一座半圆形的拱桥来；公社社员丈量不规则的田地分成很多小块来量，加起来就是整个田地的面积。用这些学员熟悉的事例，说明



当局部和整体比较起来很小时，可以“以直代曲”，引出微积分的概念，这样，学员易于接受，起到了捅破高等数学奥秘的作用。然而，我们的认识过程不能就此止步。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前面这些生动事例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计算曲边图形的面积等例子，指出运用“以直代曲”的方法求得的面积，还是近似值，因为用这种方法，无论分成多少小块，“直”与“曲”还是有区别的。要求得到面积的准确值，就必须无限细分，使每一份无限缩小，一步步引导到“一个变量无限地向一个常量逼近”的极限概念上来，并运用极限方法，来确切地说明导数、微分和积分的概念、性质、内在联系、相互转化和计算方法。这样，使学员抓住了现象的实质，对微积分的方法及其运用掌握得更深刻，更准确。原来尽管大家日常碰到大量“以直代曲”的现象，却并不能立刻理解微积分的概念；而当一掌握微积分的理论，就能更深刻地感觉到微积分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并且认识到，微积分是解决曲线图形的面积、体积、重心和非均匀变化的速度等工程技术计算问题的科学方法，是劳动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之一。有一个工人学员毕业回厂后，就运用微积分的方法，计算出了不规则形状的液氮贮槽内体积和液面高度的数量关系，解决了液氮产量的计量问题。教学实践表明，在基础理论课教学中，既注意从形象化教学开始，又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既通过一些生动事例了解问题的实质所在，又牢固掌握科学理论的抽象思维方法，就能使学员真正具有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几年来的教育革命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处理好形象化教学和培养科学抽象能力的关系，就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持两点论，克服片面性。划清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论证与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的界限；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形象化教学与事事要求直观的界限；教学中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和反复巩固与烦琐庞杂的界限，从而使基础理论课改革沿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前进。



根据工人学员的特点组织理论教学

中国共产党上海机床厂委员会

怎样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人学员进行理论教学？我们从“七·二一”工人大学四年来的实践中体会到，必须根据工人学员的特点，在教学活动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工人学员在扩大实践的基础上往理论方面提高，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什么是工人学员的特点？有人把它仅仅理解为文化基础知识差，以为对他们进行理论教学，要比过去直接从高中招收的学生“难弄”得多。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工人学员肩负着阶级的委托上大学，满怀为无产阶级掌握技术大权而刻苦学习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一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这是搞好理论教学的重要基础。只要我们在正确认识工人学员特点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组织理论教学，就可以使工人学员克服文化基础知识较差带来的暂时困难。

那么，为什么有人觉得“难弄”呢？主要是教学对象变了，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和教学方法并没有跟着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一位力学教员，讲同样内容的课，由于教学方法不同，效果就完全两样。他在第一期讲“空间力系”课时，按照在旧大学讲课的思路，先在黑板上画出一对齿轮带动主轴运转的图形，再用颜色粉笔画了很多箭头表示受力方向，红红绿绿一黑板，虽然讲得很带劲，但许多学员仍然听不懂，有的甚至越听越糊涂。为什么在旧大学行得通的东西，今天却行



不通呢？他从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旧大学的教学方法不符合工人学员的特点，教的人和学的人是两种思想方法，对不上号。后来，他作了改进，在第二期讲同一内容时，首先讲明这堂课的教学要求，随后让学员阅读有关教材，启发学员联系机械运动的实际情况，自己画箭头分析力系。由于引导学员大胆发表看法，引起争论，促进思索，教员有针对性地重点讲解，很快就帮助学员掌握了这堂课的内容。

从这两堂课的教训中，我们明确了一点：教学对象变了，教学方法也必须变。旧大学直接从高中招收的学生，本来就是实际不沾边，从书本到书本走过来的，用那一套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还能应付得过去。现在，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人学员在学习上善于从感性入门，对他们讲课必须联系实际。如果再按照老一套来给工人学员讲课，就必然通不过。教员要上好课，应该虚心地向自己的工作对象做调查，了解工人学员的学习特点，逐步深入地摸清他们的学习规律，帮助他们从感性到理性进行学习。我们有一位数学教员，由于比较注意同工人相结合，讲课不但能用一些生产实例来解释理论，还会用工人语言来说明抽象的概念，受到学员欢迎。而另一位数学教员，讲课不会联系实际，语言也是旧的，学员意见一大堆。这难道是工人学员“难弄”吗？分明是旧的教学方法不适应工人学员特点所造成的。对这样的教员，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指责，而应当热情帮助他们改革教学方法，逐步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

根据工人学员的特点进行教学，并不是要教员被动地围着学员转，而应主动地积极引导和帮助学员去实现正确的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有过这样的情况，有的学员由于对要学的理论和生产实践的关系一时弄不清楚，碰到困难就想后退，甚至说：辛辛苦苦学这个有啥用？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回避实现教学要求的困难，更不能埋怨学员。正确的做法是：第一，要检查所教的东西是否真正有用；第二，即使是有用的理论，也要注意讲清它和生产实践的关系，调动学员的主动学习精神，克服困难去掌握。比如，有的学员觉得过去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也照样搞生产，曾有“高等数学无用”的想法，上数学课就感到头痛。教员在讲课时，就从生产实



际引进概念，启发学员自己动手解决生产实际中的数学问题，使他们认识到，高等数学不是无用，而是很有用。这样，学员为革命学习高等数学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不仅上课专心致志，还在完成布置的作业以外，主动深入钻研。这个转变过程说明，只要从工人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讲明学习技术理论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就能使学员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办法，积极实现教学要求。

还有些同志认为工人学员所以“难弄”，是因为他们文化基础知识差，如果削减内容，放慢进度，就“好弄”了。这种降低教学质量的消极看法，实际上是用旧大学招生标准来衡量新大学的工人学员，把他们非本质的东西当作本质的东西来对待。尽管今天有部分工人学员的文化基础知识较差，给他们钻研技术理论带来了暂时困难，但是，不能把这种困难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更不能以此为理由来降低教学质量。应当看到，工人学员的实践经验是一种宝贵的知识。这是旧大学的招生对象根本没有的。我们组织理论教学，固然要为他们适当补一些文化基础知识，但更要注意发挥他们有实践经验这个长处。这样做，就可以帮助学员较快、较好地学习技术理论，提高教学质量。例如旧大学五年制机械制造专业的机械制图课，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讲解概念，一般要讲授一百八十学时，加上两倍的课堂作业时间，总共需要五百四十学时才能学完。课程结束时，学生一般只能画画自来水龙头、齿轮油泵和简单减速箱的装配图。“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制图课，从生产实践中的典型零件出发，启发学员举一反三，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律，着重训练把实物反映到图纸，又把图纸回到实物的能力。讲课及作业时间一共一百四十学时，其中讲课时间三、四十个学时就够了。课程结束时，学员可以画出较为复杂的磨床部件的装配图。这就有力说明：按照工人学员的特点，做到精讲多练（即讲授要精，实际训练要多），进度不是放慢了，而是加快了，质量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要发挥工人学员有实践经验这个长处，就不能满足于他们原有的实践经验，必须在理论教学中继续扩大和加深他们的实践基础。而有的同志认为，工人学员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并不缺实践，在校期间只要给他们多讲点书本



理论知识就行了。这种看法对吗？

毛主席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实践论》）理论教学过程也同样离不开实践。工人学员虽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就每一个人来说，由于所在工厂、工种和工龄不同，实践的深度、广度并不一样，他们的实践经验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何况生产实践在不断发展，学员原有的实践经验是不能完全满足理论教学要求的。因而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扩大和加深工人学员的实践基础，就很有必要。为此，我们在学员进校以后，先安排一些必要的热加工、冷加工、装配等劳动，使学员对磨床的性能、结构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基础知识学习阶段结束以后，又安排了一个典型产品的设计，并在设计前组织参观访问，调查研究，让学员多方面熟悉工人群众的实践经验。设计方案确定以后，再在车间工人的制造实践中加以检验。在此过程中，组织学员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努力使学和用对上号，教和学挂上钩。当然，工人学员在扩大实践基础上学习理论知识，还要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巩固和加深。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原来从未接触过磨床的工人学员适应了理论教学的要求，就是一些多年同磨床打交道的工人学员也感到底子厚了，思路宽了，提高理论快了。

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人担心：实践多了会削弱理论教学，这样能从工人中培养出技术人员吗？

究竟是脱离实践学理论能培养技术人员，还是在扩大实践和反复实践中学理论能培养技术人员？我们坚持了后一种做法，证明效果是比较好的。去年七月毕业的第一期工人学员，一年来有的完成了要求较高的机床设计，有的在技术革新中作出了显著成绩。有一个冷作工，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提出设计一台油压机，代替某些手工操作的低效率的笨重劳动。当时，有的人说：“你一不懂理论，二不会画图，还能搞设计？”后来，找了个旧工科大学毕业生承担这个设计任务，搞了两年多，遇到几个技术关键束手无策，不了了之。这位冷作工经过“七·二一”工人大学两年多的学习，回到车间以后主动挑起了这个担子，在各方面的帮助支持下，攻下了那些技术关键，两个多月就完成了一台七十五吨油压机的设计制造。他深



有体会地说：单凭过去敲打铁皮的一点经验，是很难上升为一般技术理论的。事实告诉我们，象旧大学那样靠死啃书本培养出来的人，一到实践中就暴露了弱点。旧工科大学有三十多门课，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学生关门读书五、六年，看来理论基础是打得很“深”很“厚”了吧，可是毕业以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差，有的则根本不会。要真正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还得在生产实践中从头学起。我们的工人学员则不同，他们是在扩大加深实践基础条件下打理论基础，着重培养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问题的能力，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独立工作的本领，这样培养出来的人，真正能解决问题。

列宁说：“我们决不能象旧学校那样，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青年团的任务》）而我们有些同志，总觉得只有象旧大学那样，才称得上理论基础厚，才象个大学的样子。缩短学制，精简教材，决不是时间和教材的简单压缩，而是打破旧大学那种烦琐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的结果。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不能用上课时间的多少和教材的厚薄来衡量理论基础的深浅。我们检验理论基础的深厚，不仅要注意量的分析，更要注意质的分析，不能只注意书本知识，而应当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以为一讲实践就排斥理论，一讲理论又否认实践，这是一种顽固的传统偏见，必须抛弃。如果按照这种偏见去组织理论教学，就必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坚持哪一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教学，这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万万小看不得。

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厂办工人大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决心戒骄戒躁，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先进单位学习，为实践毛主席的“七·二一”光辉指示，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而努力奋斗！



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

随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发展,如何搞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已成为当前深入教改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过去的基础理论课教学,盲目追求所谓“广博、深厚的基础”,烦琐庞杂,理论严重地脱离实际,学生负担太重。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进行了各种改革试验,基础理论课教学开始出现了新面貌。

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学校中基础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得还不够。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以利于对工农兵学员的培养,需要及时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基础理论课,主要是讲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训练基本实验技能。它对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为专业课学习准备必要条件,并使学员具有一定的知识面,以适应将来工作和继续提高的需要。

近代各门科学技术,是以基础学科所阐述的一般规律为理论基础的,是这些理论在自然科学某一专门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学员只有掌握了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才能较好地接受专业方面的训练。在学员毕业以后所从事的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或其他的实际工作中,不仅要用到有关的专业知识,还要用到许多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如果缺乏**坚实**的基本训练,他们就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去学习、**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在飞跃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等学校的教育必须跟上这个形势。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对于培养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科学技术干部,高速度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那种认为基础理论课无用,可以不学或只要捎带学一点就行,是一种近视的



观点。

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关系密切，但各有不同的任务和作用，不能互相代替。基础理论课所讲的一般自然规律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如果硬把基础理论课拆散，和专业课揉在一起学，“碰到什么讲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就会割断这种联系，使学习零敲碎打，无法循序渐进。不是专业课“鼓肚子”，就是基础理论课被挤掉，“阶梯”太陡，教学被动，“想快快不起来，想深深不下去”，想找“捷径”反而走了弯路。教育革命实践证明，必须注意基础理论课本身的系统性、连贯性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基础理论课一般应在专业课之前单独设课，系统学习；同时，一定要改变过去各门课程各自为政、烦琐庞杂的现象。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基础理论课要为专业课的学习做好准备，**专业课教学要注意基础理论课内容的复习、巩固和应用。学好基础理论课是重要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大学只要学好基础就行了”，那样做，同样达不到培养目标的要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基础理论课教学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线，实行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无疑，教学中联系生产实际是很重要的。毛主席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讲自然界基本规律的基础理论课，就应该接触生产活动，反映生产的需要，倾听生产实践的呼声。但是，“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所阐明的概念、规律、理论，发源于生产斗争实践，也来自科学实验和其他领域的实践活动，并且同各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因此，在基础理论课教学中，结合生产活动是联系实际的很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在实验室做实验，到社会进行调查和参观学习，了解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阶级斗争的关系，以至讲课时例举大家所熟悉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实例，等等，都是教学活动的一种方式。

实验教学是基础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验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排除干扰，借助仪器对自然现象中的某一过程进行精密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所以，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密切配合，能够启发学员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帮助他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认识事物，更好地掌握基本规律。在实验室做实验，是基础理论课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形式，而且，它还担



负着培养学员科学实验技能的任务，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许多学校的经验证明，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和参加校办工厂的生产实践，把学习生产实际知识和学习书本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加强了基础理论课教学和生产实际的联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有些生产过程比较复杂，涉及的知识比较综合，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结合教学是比较困难的。基础理论课联系实际，应首先服从于学好基本理论、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主要目的。所以，应当根据各门课程的特点和教学要求，适当地选择生产过程、科学实验和其它实践活动的实例，以保证基础理论课教学能够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教给学员本专业所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

在基础理论课教学中，要真正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讲清基本规律和基本概念，就必须重视科学的抽象。因为，“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基础理论课联系实际，给予学员一定的实践经验是必需的，但不能停留在感性知识上，应当向理性认识阶段飞跃；例举一些直观的、形象的比喻帮助学员了解某些基本概念是有益的，但还要引导学员进一步掌握正确的科学定义。旧基础理论课教学片面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必须改革，但不能忽视必要的理论推导，要注意培养学员科学抽象、逻辑推理的能力。如果在讲课中把科学的抽象和理论联系实际对立起来，只给公式，不讲推理，只介绍实例，不讲清概念，回避抽象思维、理论分析和数学运算方面的训练，是不能学好基础理论课的。

加强了基础理论课学习，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一来，会不会就是“走老路”，会不会又变成“三脱离”。这是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

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基础理论课，在本质上同旧学校是不同的。我们决不是要再重复多而杂，而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增加学时和增加内容，而是要在改造上用气力，这正是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表现。旧基础理论课教学片面强调打基础，盲目追求“广博深”，学制越来越长，学生负担过重，把身体也搞坏了。今天，遵照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教导，学校注意了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即针对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针对专业课学习的需要，针对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来确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精简课程，改革教材，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已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辩证唯物论者尊



重自然科学历史的发展。对过去基础理论课的内容，既不是采取一概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也不是一概肯定，“兼收并蓄”。旧教材有正确，也有谬误，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具体分析哪些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哪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内容，“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并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分清哪些是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哪些是次要的，正确地加以取舍。同时，教学方法也要不断进行改革。废止注入式，实行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这些都是区别于旧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显著标志。如果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看作“走老路”，不去正确对待基础理论课教学，实际上正是回避了基础理论课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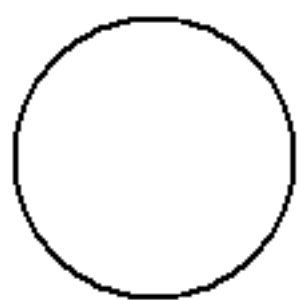
基础理论课的改革对教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教师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牢固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自觉地在教学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对工农兵学员要敢于严格要求，大胆管理，重视对他们的基本训练，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基础理论课教师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业务上都需要尽快提高，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为革命钻研业务，不断克服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和专业基础知识缺乏的状况，以适应教育革命迅速发展的新形势。

毛主席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基础理论课的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种不经过一定时间实践的检验，简单地轻率地作结论的办法是有害的。应该鼓励革命师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勇于实践，允许不同方法的试验和比较，及时总结经验，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推动基础理论课改革不断前进。

基础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旧教育制度的传统影响在基础理论课教学中还是很深的，彻底清除这一影响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需要的体系来，任务还很艰巨。只要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开展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不断肃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就一定能搞好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出贡献。



切实做好厂校挂钩



裴 玉

去年，我部承担了有关理工科高等院校一百五十多个专业对口管理的任务，其中，安排这些专业跨省、市的厂校挂钩，又是我们经办的主要任务之一。现在，不少院校已同工厂建立了挂钩关系。这不仅对学校的教育革命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挂钩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也起了积极作用。通过这项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

过去，有些同志总认为教育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与工业部门无关，甚至把它当作一种额外负担，不愿管。这说明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到教育革命的重要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教育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激烈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没有各条战线、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关心和努力，是很难真正搞好的。厂校挂钩，是教育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是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重要措施。如果我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者当作额外负担而不去管，那就会给教育同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后门，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我们工业部门必须把协助安排好厂校挂钩，搞好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来认识，把它作为我们工业部门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来承担。

工厂下放地方管理以后，中央的工业部门对厂校挂钩的工作还管不管，管多了会不会影响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重走“条条专政”的老路呢？我们认为，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学校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地方把学校办好，既要反对“条条专政”，又不要撒手不管。在解决厂校挂



钩问题上，对口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协助地方作好这项工作。同一些工业部门对口的高等院校，不少是综合性、多科性的，全部在一个省、市以内来解决厂校挂钩问题，除个别地区外，都是有困难的。特别是许多工厂刚刚下放给地方，工作一时接不上茬。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工业部门必须给予积极协助，帮助地方打通渠道，解决困难，这正是加强了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如果片面强调分工分管，该由中央工业部门去办的事情不敢去办，看着困难不去帮助解决，那是不负责任的错误态度。

安排厂校挂钩，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努力做到学校专业和工厂生产相对口。开始有些同志感到专业要求的广泛性与工厂生产的局限性有矛盾，这项工作难做，有点望而生畏。其实，只要深入了解各个工厂生产的特点，摸清各高等院校专业设置的实际情况，这项工作也是可以逐步做好的。有的专业针对性强，专业面窄，较容易选择对口工厂；有的专业面较宽，通用性较强，则尽量做到所选挂钩工厂的产品，对专业来说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有的专业还可以和几个工厂挂钩，以适应教学的需要。除了建立固定挂钩关系外，为了增加师生广泛接触本专业生产实践的机会，对口专业派教改实践队进行社会调查时，还可另外选择若干个代表性工厂，建立临时性的结合关系。只有少数基础理论性较强的理科专业，由于这些专业当前主要是采取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安排固定的对口工厂比较困难，可在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学校专业分布与对口工厂分布不相一致怎么办？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应该是，尽可能就近就地安排挂钩工厂。这样便于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安排教学，也可为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就近就地确实没有对口工厂的，则应从教学需要出发，帮助安排跨省、市的挂钩工厂。少数同志喜欢舍近求远，不愿和就近就地的小厂挂钩，这种看不起小厂的思想是不对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许多小厂为国家做出了大贡献，它们也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着，这里同样有着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值得学习，有着许多新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些不正是我们搞好教学的有利条件吗？有些专业就近就地与小厂挂钩，工厂对挂钩任务非常重视，学校和工厂密切结合，使教学改革获得了较好的成果。

学校教学与工厂生产是性质不同的两项任务，我们必须全面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它们之间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处理不好，会给教学和生产带来不利。但它们又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面，如果处理得好，可以做到既有利于教育革命又



有利于工厂生产。只看到教学影响生产，因而对教育革命不热心，不积极支持，是错误的。只看到教学促进生产的一面，因而对厂校挂钩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不认真地加以解决，同样也是不对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过去，理工科大学的师生也下厂搞“实习”或“设计”，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那种下厂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开开眼界，或为个人成名成家搜集资料。不少人下厂之后，身不沾油泥，手不拿榔头，只是这个车间走走，那个车间转转，虽然身处三大革命运动之中，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脱离广大工人群众。这样“下厂”，必然给工厂造成很大负担，影响生产。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实行厂校挂钩，开门办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厂和学校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共同努力。工厂党委不断加深对教育革命的认识，加强对厂校挂钩的领导，选派优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教改工作。学校师生积极参加工厂的三大革命运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有的承担工厂一定的科研、试制任务，协助工厂开展职工技术教育等等。这样，既促进了学校的教改，又给工厂培养了技术力量，促进了工厂科研、生产的发展。

许多单位挂钩关系处理得好，其主要经验就是，从革命的全局、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学校要经常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和流毒，强调向工厂学习，师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不能片面强调教学需要，强调“以我为主”，向工厂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工厂要热情支持厂校挂钩这个教育革命的新事物，把协助搞好教育革命看成是自己的光荣任务。对于存在的一些片面的、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厂校领导必须从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着手，在实践中加以克服和共同解决。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基础上，还要注意进行必要的组织制度方面的建设。目前，不少工厂指定了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厂校挂钩方面的工作；一些院校同挂钩工厂签订了协议书，把厂校双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用制度明确规定下来；有的学校派部分教师去对口工厂兼任某些工作，协助解决生产、科研方面的问题；有的工厂派工人、技术人员到院校参加教改工作，担任兼职教师或专业领导工作，等等。我们认为，这些形式和方法都是可取的，今后还应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改进和推广。

（本文作者为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人员）



发挥“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上海市吴淞中学党支部

一谈到提高中学教学质量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往往只想到在校内教育和课堂教学中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不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忽视组织课余活动和参加校外社会实践。

有的同志认为：中学生年龄小，知识少，全靠教师教。这种说法，实际上把“学”的积极性否定了。学生要学习好，当然首先教师要教好，要注意发挥教师教的积极性。但是，光有这一面还不够。我们有的教师辛辛苦苦备课，一上讲台就一个劲儿地讲，的确很努力，但就是没有认真研究一下学生听进去多少，效果究竟如何。学生的学习是一个通过自己的思想器官对外界的认识过程，教师讲得再好，也要通过学生头脑的思考，才能逐渐接受下来。离开了“学”的积极性，“教”的积极性也必然落空。改革旧的教学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实行启发式教学，这主要是为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要启发学生，就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学校一些语文教师在讲授鲁迅的《故乡》时，不是静止地分析课文的主题思想，而是抓住学生与少年闰土某些相通的特点，联系学生周围的事物，引导他们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地学习。学生对闰土脑子里“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很有兴趣，课堂就活跃了，议论纷纷，都很关心和同情闰土的遭遇。教师再诱导学生从闰土形象的变化中认识旧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学生经过思考，很快就接受了课文的思想内容。

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在教学活动中创造一些条件，让学生亲口去尝一下“梨子”，才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并逐步锻炼和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基课在讲了电流变化规律的基本概念后，让学生在“照明电路”示教板上安装电灯、导线、闸刀、火表。教师再加几只灯泡，保险丝立即烧断了；把保险丝加粗，导线又冒烟了。这立即引起了学生的注意，他们透过现象寻找原因，摸索规律，并且交头接耳进行了热烈讨论。这时，教师因势利导地指出：电流通过导体要发热，保险丝烧断、导线冒烟，表明电流强了，是与电灯的功率增大



有关。这使学生不仅学会了根据用电器功率大小的变化去掌握电流强弱的变化，并能处理电路上由此而引起的具体问题。这个例子说明，上课一定要有生动的实际内容，并辅之以活泼的教学形式，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积极地开动思想器官，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我们讲要调动“学”的积极性，决不是否认“教”的积极性，正是为了使“教”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出来。“教”和“学”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割裂的。因此，一定要把“教”和“学”两方面结合起来。教师在学生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要参加学生的讨论，启发学生把学习积极性用到思考关键性的问题上去。教学环环入扣，才能使学生的思路围绕着教学内容的中心线索放得开、收得拢，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又提高了思维能力。

为了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课余活动就决不是多余的，而应当把它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起来。生动活泼的课余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教师应当在组织课余活动方面，也发挥出积极性来。但我们有的同志往往把学习理解得很窄，把课余活动的组织工作看作是多余的负担，以为可管可不管。或者认为课余难管，对课余活动加以种种不应有的限制。学生不在眼前了，他们就不放心，或以“整”自流散漫现象为名，反对提倡学生的正当兴趣和爱好，并采用加重作业的办法，把学生的课余时间都夺过来。这些同志不懂得，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就是为了让学学生生动活泼的学习精神能够得到发展。即使在课余活动中出现了自流散漫的现象，或者由于片面的兴趣和爱好影响了学习，也不应当采取简单化的做法，来个一“整”二“卡”，而应当注重正面教育和正确引导。如果我们想用一個模子来把他们整平、套死，学生那里还有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精神呢？

现在，学生主动要求学习课程和课本以外的知识，不是个别现象。既然出现了，只要方向对头，就应爱护、支持和鼓励这种宝贵的主动学习精神。这样做，不但不会削弱课堂教学，反而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比如，学生学了半导体知识，对电子学产生了很大兴趣。教师就指导他们刻苦钻研，反复试验，帮助他们在学工小组制作一些简单的电子仪器。学生在看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教师就认真指导课外阅读，举办讲座，组织学习鲁迅作品的课外小组，并在语文课中增设这方面的内容。这都大大增强了学生为革命钻研学问的积极性。一般说来，课余活动涉及的知识面要比课堂教学广泛、复杂而且形象，有利于学生主动地把各门课程联系起来，逐步融会贯通。只要引导得好，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经过课余活动就能够进一步领会、消化和充实。



正如“课余”不是“多余”一样，教师也不能把校外教育当作分外事。要做到教学中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把教学活动搞得生动活泼，还必须把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结合起来，适当组织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社会实践。如果不在教学活动中充分重视社会实践的作用，对学生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不加爱惜和提高，那末学生就不能逐步建立实践第一的观点，也不能得到更全面的知识。

学校教学活动中的一些难题，往往就是因为不重视校外社会实践而长期不能解决，弄得“教”“学”双方都吃力不讨好。一当我们把校内教育和校外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局面就有改变。例如学生的写作能力，一向是语文课难破的关键。教师不厌其烦地空讲写作技巧，学生还是写不出象样的东西。后来，我们的一些教师在学工、学农中组织学生搞社会调查，帮助学生分析大量的感性认识材料，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也讨论了写调查报告的方法。学生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教师挑选了较好的几篇，讲评交流，这不仅对学生提高写作能力帮助较大，而且对他们的思想教育也起着积极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和“学”双方的积极性同时发挥出来，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教师要在组织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积极性，就必须主动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要办好校办工厂、农场，更要这样做。几年来，我们与一些工厂和公社固定挂钩，学生经常带着教学中的问题去那里参加实际斗争。在这些单位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我们的校办工厂、农场结合教学任务，制造了二百多只手提喊话器，修理了二百多台马达，装配了一千多架半导体四管收音机，生产了一批固体电路，土法试制成功农用、医用微生物等二十多种。当听说附近棉田发现棉铃虫时，一些学生就在贫下中农和教师的具体指导下，把“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反复试验，把试制成的农药用于棉田，二十小时内棉铃虫就大批死亡。有个毕业生在国营农场认真接受再教育，运用学到的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后来群众推荐他到大学生物系学习，又成为那个专业中比较优秀的学生。

实践证明，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生动活泼地组织教学活动，就能够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几年来，一批批毕业生愉快地奔赴祖国各地，正在逐步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深信，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英明指示，既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又注意启发学生的积极性，把课堂教学和课余活动结合起来，校内教育和参加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



小评论一组

(六篇)

本刊一九七〇年第二期曾发表过一组小评论，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再发表几篇，也都写得生动活泼，新鲜有力。这样的短文应该多写，使它成为我们经常批评错误思想、表彰先进事物的战斗武器。

本栏欢迎在基层的同志给我们写稿、寄反映、出题目。

——编者

赞“笨鸟先飞”

江苏东台县城东公社评论组

我们公社有位领导同志，克服文化低的困难，坚持认真看书学习，一年多来，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马、列的书和《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提高，并且有效地指导了工作。

较低的文化水平为什么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呢？这位同志的回答是：“干革命就要认真读书。只干不读，路线糊涂；边干边读，路线清楚。自己识字少、水平低、理解慢，别人读一小时，我就读两小时；别人读一遍，我就读两遍；别人请教一个人，我就请教几个人。学个‘笨鸟先飞’。”



这话说得好！其实，这种笨鸟并不笨。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笨和巧是对立的统一。笨含以巧，巧寓于笨，在一定条件下，无不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是这个意思。能想到自己是只笨鸟，下定决心先飞，实际上就是聪明的开始。

笨鸟精神就是老实态度。在科学面前，就需要这种老实态度，因为，“**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学习马列主义，不能抄“近路”，不要找“捷径”，不要怕花力气，要一句一句地领会含义，一篇一篇地吃透精神，一本一本本地把握实质。俗话说，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坚持学习，定能进步。

有笨鸟先飞，也就有巧鸟后飞。我们周围也有些同志在看书学习方面自恃聪明，怕费力，图省事，生吞活剥，不得要领；或者自以为有时间，反正来日方长，结果时不我待，至今收效甚微；或者自恃心有灵感，不去刻苦钻研，只是浮光掠影，结果总是似懂非懂。这种学风发展下去，在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面前，昏昏然真假难分，好坏不辨，又会上当受骗。“聪明反为聪明误”，这话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让我们都来发扬“笨鸟先飞”的学习精神，“**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小仓库”与“大仓库”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评论组

“小仓库”与“大仓库”，这是在我们厂里经常要闹的一对矛盾。

有些工人同志到仓库去领料总想多领一些，在工具箱里东塞点，西塞点，用起来可以方便点。管仓库的同志就有意见了：你们都搞“小仓库”，还要不要我这个“大仓库”？



但是，有些管“大仓库”的同志，对下反对搞“小仓库”，对上却同样暴露出“小仓库”思想，总想多领点，多买点，甚至不惜打横交道、开后门。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些材料本厂多得用不了，兄弟厂想要要不到。

最近，全厂工人通过学习、讨论，又搞了个展览会，批判这种“小仓库”思想。

“小仓库”思想的一个借口是为了生产。有些同志从他们的意图来说，也确实是为了生产。但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要影响生产的。一个厂，或者一个工人，领了超出正常需要的材料，就不能使国家的物资通过有计划的合理供应，发挥最大的作用。“小仓库”的物资多了，“大仓库”的物资就少了，一个部分的生产任务可能完成得不错，但因破坏了国家供应计划，就会影响别的单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厂有位同志抢先领了一批齿轮表，有十几只一直在他的“小仓库”里睡大觉，兄弟班组一时急用却领不着又买不到，只好眼睁睁等着。可见，这种“小仓库”思想，就是为自己开方便之门，为别人关方便之门，正象毛主席批判小团体主义时所说的，“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

“小仓库”思想，是和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教导背道而驰的。搞了“小仓库”，东西多了，思想却懒了，不动脑筋，不挖潜力，不能做到物尽其用，不愿进行经济核算，时间一久，就会养成资产阶级大手大脚作风。我们厂通过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许多工人同志主动上交了“小仓库”中的物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发扬了。例如，梭子保养小组几位工人同志，积极动脑筋为国家节约物资，到废梭堆里拣出一大批坏梭子，整修以后再用，把原来计划领用的五、六百只新梭子全部归还给“大仓库”。

我们要反掉“小仓库”思想，但同时也要求“大仓库”要尽量方便生产，方便群众。从局、公司的“大仓库”来说，要多为基层着想；从一个厂的“大仓库”来说，要多为生产工人着想。我们厂里，过去有些工人所以要搞“小仓库”，原因之一是到“大仓库”领点料，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签名盖章手续，浪费工时太多。最近，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仓库人员把常用、小件的材料送上门，又在各个车间设了供应点，夜间值班，随要随领。物资供应计划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研究



制订，每月召开平衡会议，有矛盾协商解决。这样做了以后，讲节约、修旧利废、综合利用逐渐形成风气，物资消耗显著下降，向外订货逐渐减少，使“大仓库”储备的物资真正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

学不学技术一个样吗？

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人评论组

前一时期，我们厂各个车间办起了技术学习班，许多青年工人踊跃报名参加。但也有些青年工人不想学，他们说：“学不学反正一个样！”

学不学技术是不是一个样呢？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厂承担了制造一百二十吨纯氧顶吹转炉的光荣任务。青年人志气高，主动要求加工大齿轮这个关键部件。这时候，平时勤学苦练的，就敢挑重担，很快掌握了切削技术，还改革了刀具，一个月的任务不到二十天就干好了。平时不磨刀枪的，齿数不会算，刀具不会选，急得直冒汗，最后任务只好叫别人代完成。可见，学不学技术大不一样。

我们干的每一项工作，无论是车一个螺丝，加工一个部件，都是和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工人做不好工，就象战士打不好仗，农民种不好地，不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技术。要想真正学到一点有用的技术，非经过长期努力不可。拿我们厂来说，无论车、钳、刨哪一个工种，都有一些老工人，他们长期磨练出来的精湛技艺，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青年工人一定要把它学过来，并且进一步发扬。怎么能说学不学一个样呢？

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认为学好了技术待遇不一定会好一点，学不学一个



样，那么这种想法更是我们每个革命青年都不应当有的了。毛主席曾经批判过革命队伍内那种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的错误观点。如果从个人待遇上来考虑学不学技术，那岂不是把自己同革命的关系看作被雇佣的关系了吗？我们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象《海港》里马洪亮唱的那样：“出尽了牛马力难养老小，为工票忍饥寒他苦熬通宵”，那是多么残酷的阶级压迫呀！他们那时要学一点技术，不知包含着多少阶级苦、辛酸泪。想想这些，再看看今天我们青年工人，党和毛主席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一进厂，就有老师傅带我们、关心我们。特别应当看到，我们劳动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革命，这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雇佣劳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怎么能以报酬的多少来决定要不要学习技术呢？

过去，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会儿鼓吹“奖金挂帅”、“技术第一”，妄图用物质刺激腐蚀我们工人阶级的思想，使我们只关心个人的眼前利益，忘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一会儿又叫嚷“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一概否定学习技术。因此，我们必须把要不要为革命认真学技术，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要上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当。

“制度一订，万事大吉”是不对的

南通七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

在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中，我们厂发动群众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制度无用论”，制订了一系列产品质量检验制度。有的干部满以为这下子一定解决问题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产品质量还是“桌子底下放风



等——上不去”。

问题在哪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一订，万事大吉”的思想在少数干部头脑里作怪。

合理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对保证质量十分重要。但是，制度是要人去执行的。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依靠工人群众订出，同样要依靠工人群众的高度自觉来执行。因此，订了制度以后，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进行路线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从思想上充分认识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自觉地维护和执行规章制度。放松了这些工作，订得再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东西，对提高产品质量不能起到促进作用。

质量检验制度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要保证产品质量，还有许多生产管理上的工作要做。比如说，发动工人进行操作练习，大搞技术革新，组织经验交流，等等。这怎能说，仅仅有了制度就可以“万事”都“大吉”了呢？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都是绝对完善的，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矛盾。一方面，每一项质量检验制度都是根据当时对产品的具体要求，以及技术条件 and 生产水平等情况制订的，它是相对稳定的，不能总是变来变去，使工人群众无所遵从；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其中有的部分必然会变得不相适应，需要修订。哪些部分不能变，哪些部分要调整，哪些部分要补充，只有领导干部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妥善地加以解决。我们厂的产品检验制度，从一九六九年底到现在，已经修订了四次，每次修改都对生产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订了制度以后，是“万事大吉”，放松领导，还是既抓制度，又抓思想，做过细的工作，实际上是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的表现。金工车间小件组的干部，在执行制度问题上，克服松劲思想，抓紧路线教育，加强管理工作，全组同志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五月份以来，小组废品率从原来的百分之二点五，下降到平均每月百分之零点六三。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



评“熟人好办事”

建湖县庆丰公社党委书记 罗长耕

前一时期，我们公社的少数人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熟人好办事”！就是说，通过一般人办不到的事，一和“熟人”打交道，便能办到。这种事情虽是个别的，但在我们公社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一股不正之风。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总有一些比较亲近的“熟人”，也总要“办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办事也是有阶级内容的。我们无产阶级办的是革命的事，不论熟人、生人，都应该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按党的原则来办。不能因为是“熟人”，就放弃党的原则，不顾革命利益。越是“熟人”，越要共同为贯彻党的政策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这是我们每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

那些信奉“熟人好办事”的人，心目中根本没有党的原则和革命的利益，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彼此讲资产阶级的“人情”、“面子”。“香烟一衔，办事优先”，有的甚至请客送礼。他们的所谓“办事”，无非是互相沾光，彼此利用，完全离开革命的轨道。这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气味，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

这样说，那些为本单位、本系统“办事”的人难免要发火了：“我又没往腰里揣，往家里带，还不是为了集体好。”其实，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只看到局部利益，眼睛只盯着本单位，而忘记了兄弟单位，忘记了全国一盘棋，这不是放大的个人主义又是什么？更不用说那种“熟人”背后，“办事”之中，搞私人交易，混水摸鱼的人了。

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鼓吹“朝中有人好做官”，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权思想。刘少奇一类骗子宣扬什么“有了困难找朋友”，是妄图涣散党的组织和纪律。“熟人好办事”，就是这些反动思想的流毒，是一种腐蚀剂。它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国家计划受到破坏；使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被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侵袭，也使社会



上的阶级敌人有机可趁。我们有个生产队，为了搞化肥，就吃了这种“熟人好办事”的苦头，被一个投机倒把分子钻了空子，影响了集体生产。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事实上，只要符合党的政策、符合革命全局利益的事，不管是不是“熟人”，总是“好办”的。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处有事、八方支援的事例，蔚然成风，到处可见。与此相反，那种坚持“熟人好办事”的人，他们的“事情”终究是不大“好办”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和自觉克服这种不正之风，同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事，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胳膊朝哪里弯？

上海闵行光明食品商店 魏重阳 张玲云

胳膊朝哪里弯？这个问题是搞商业工作的同志常常碰到的，在我们商店里争论得可激烈哩！

有一次，一位顾客通通通跑来，说是买去的半斤饼干，回家一看，有些已经发了霉，要求调换。我们有位营业员马马虎虎看了看，就说好好的饼干，不能调换。顾客还是不走，旁边几个营业员走拢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帮自己人说话，七嘴八舌地把人家顶撞走了。事后，我们仔细一查，确实在一只饼干箱里发现了发霉的饼干，这才弄清楚是我们自己错了，赶紧去向那位顾客道歉，主动把那半斤饼干换了回来。

象这类事，我们碰到的还有一些。有时明明知道是我们营业员有错，但却认为在顾客面前不好拆自己人的台脚，无理也要帮着争三分，这叫作“胳膊总是朝里弯”。



“胳膊总是朝里弯”究竟对不对？有的同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商店，应当一切为工农兵着想，哪能不分是非胳膊总是朝里弯。有的同志主张朝里弯，说这是为了维护商店的利益和声誉，又不是为了自己；何况食品质量差不是经常有的事，动不动向顾客交底，这是自己敲自己的招牌。后来经过学习、讨论，大家认为后面这种说法不对。

“胳膊总是朝里弯”是为了维护商店的声誉吗？一位老店员在回忆对比时说到：旧社会，商店老板总是吹嘘自己的商品“价廉物美”，摆“噱头”，搞虚假，还一再要店里的学徒工“胳膊总是朝里弯”。这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原来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自己剥削罪恶的欺人之谈。我们社会主义商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难道还要用“胳膊总是朝里弯”这一类资本家的生意经，来原谅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吗？

为了商店的利益就可以“胳膊总是朝里弯”吗？工农兵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商店的利益和工农兵的利益是一致的。商业工作者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着想，也就是真正“维护商店的利益”；不从工农兵的利益出发，还谈得上什么“维护商店的利益”？如果硬是同工农兵分“里外”，实际就是把商店的利益同广大工农兵的利益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和工农兵的关系，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人和顾客的买卖关系。营业员不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一边，结果必然是表面上“面朝工农兵”，实际上“心隔一堵墙”。我们为了维护工农兵的利益，自己动手拆了自己错误的“台脚”，那正好是拆去了营业员和工农兵之间心隔心的那堵墙。

“胳膊总是朝里弯”还有一个“理由”是：一个商店一家人，自己人总得帮自己人。这也是不对的。这种“帮”，不讲路线，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模糊了阶级阵线。表面上是帮助同志，实际上是推着同志犯错误，帮得越起劲，害人越是深。我们店里就有这样一个教训：有个青年营业员，开始只是见了熟人卖个人情，大家知道了也不批评指出，他后来发展到一有畅销商品就开“后门”，终于走上了犯错误的道路。我们社会主义商店的营业员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种关心和帮助要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毛主席所教导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 影 评 ·

拍摄更多更好的科教影片

方 亮

努力拍好科学教育影片，是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科教影片能够形象地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摧垮了以周扬等“四条汉子”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科教电影战线出现了新的面貌，拍摄出一批较好的科教影片。已经公映的《送瘟神》、《育蜂治虫》、《断肢再植》、《无限风光在险峰》、《漆树》、《土法医治猪牛病》等等影片，虽然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但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内容是朝气蓬勃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把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同宣传党的路线、政策结合起来，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同热情歌颂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的革命创造力结合起来，因而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从这些已经公映的影片所提供的经验来看，要拍好社会主义科教影片，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充分发挥科教影片的特长，更好地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

科教影片所能表现的题材是十分广阔的。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项发明，一个创造，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至宇宙，小至细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以生动的、形象化的手法加以表现，都可以成为很好的科教影片内容。亿万革命人民的三大革命运动，为拍摄科教影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内容越丰富，就越有加以精心选择的必要。科教影片的选题必须坚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必须从工农兵的需要，从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需要出发。只有这样，你所要普及的科学知识、揭示的客观规律，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引起人们的思考，从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送瘟神》揭示的血吸虫的寄生规律和各种有效的防治方法，所以引起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系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健康；《治山造林保水土》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跟我国西北广大地区改变自然和生产面貌有直接的关系；而《土法医治猪牛病》所拍摄的“修补牛鼻子”，行之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南方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实际问题，明白易懂，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科教影片表现内容的丰富性与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应当是一致的。离开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片面强调五花八门的表现内容，表面看来题材是多样了，实际上只能使科教影片的路子越走越窄。过去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必须继续批判他们所鼓吹的什么“纯科学”、“纯技术”和所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猎奇和趣味。其实，科学技术一旦为人所掌握，就一定要为“人”所属的阶级服务；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决无既“雅”又“俗”的共同“趣味”。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要大胆实践，不断开辟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新途径。科教影片要适应广大工农兵的需要，也要兼顾专业研究和教学人员的需要；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也要兼顾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需要。

科教影片在表现科学内容的时候，要正确处理物和人的关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切社会财富，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归根到底都是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所创造的。但在修正主义路线控制下拍的一些科教影片里，历史唯物论往往被历史唯心论观点所代替。表面上是见物不见人，是物在主宰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创造科学技术的主人工农兵，反而成了科学



盾。影片讲的是“育蜂治虫”，不是农村生活介绍，因而没有必要先是以长长的“抒情”镜头展示农村的大好风光，再表现“三结合”小组如何组织、如何开展工作，再表现过去怎么不重视防治病虫害，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然后才触及本题，介绍卷叶虫的生活史。已经公映的科教影片，有几部交代过程较多，就好比城头上跑马，远兜运转，叫观众等得心焦。这是需要改进的。

从具体矛盾出发，还必须抓住重点，画面要着重表现主要矛盾。《断肢再植》所表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过程。断肢再植以后，在动脉、静脉血流平衡这对矛盾外，还同时存在许多矛盾，如血管破坏程度、肌肉坏死、细菌感染等等，但血流平衡的矛盾是关键。这个矛盾解决了，接肢能否成活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科学道理也就基本讲清了。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方能言简意明，举一反三。我们不赞成科教影片贪大求全。有些科教影片之所以使人感到有点松散和冗长，一方面固然由于有些实际工作部门提了些不尽合理的要求，例如，要求反映事情的全貌、全过程，许多应当另由新闻纪录片去完成的任务也要求科教影片包下来，等等。但主要的还是我们影片作者创作思想上贪大求全，追求面面俱到。毛主席指示我们，认识任何发展过程中的事物，都“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又说：“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这一指示，对我们拍好科教影片同样重要。

抓住了主要矛盾，还要在斗争和发展中加以表现。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摆在前面。矛盾不断解决，事物就不断前进。科教影片要辩证地讲清科学道理，就要努力表现矛盾的发展。这样，既符合事物发展和人们认识的规律，又使影片脉络清楚、层次分明。就这一点来说，影片《种花生的辩证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经过多次实践证明，花生的第一对侧枝结的花生又多又大。要花生增产，就得充分发挥第一对侧枝的作用。这是主要矛盾。但在花生的生长过程中，这个主要矛盾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显示出来的。花生下种时，保证全苗是主要矛盾，苗不全就谈不上增产。在墒情不好的情况下，全苗就得深种；但深种的结果，第一对侧枝往往埋在地下，无法发挥作用。这时，让第一对侧枝露出地面又成了主要矛盾。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又找到了“清棵蹲苗”（即扒



土)的方法,让第一对侧枝露出地面。这才解决了花生增产的关键,获得了丰收。在表现矛盾的这个发展过程时,影片比较能够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入一层,引人入胜。但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实践论》》因此,科教影片在介绍科学技术成就时,也要有发展的观点,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一分为二,讲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贬低该项发现、发明的价值,而是提醒人们在实践中注意,鼓励大家继续前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矛盾论》》科教影片当然也需要拍摄一些很有推广价值的具体的先进经验,但在多数情况下,它总是通过特殊阐发普遍意义。《无限风光在险峰》揭示喜马拉雅山区地壳内部的运动规律,《断肢再植》阐明人体血液循环的内部矛盾,并不要求观众都学会地质勘探或当外科医生。它们的意义还在于通过特殊矛盾的解剖,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以及在正确路线指引之下,人在促进矛盾发展、转化方面的能动作用,从而启发革命人民正确地认识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特殊矛盾的本质揭示得越充分,概括性越高,普遍意义也就越大。这是各种文艺样式共同的规律。因此,我们拍摄科教影片也同样要重视概括,要有剪裁,有取舍,有构思,也要讲究艺术性。我们反对科教影片追求剥削阶级的“趣味性”,但也要反对不要艺术性,粗制滥造;我们反对卖弄“噱头”,但也要搞得生动活泼,耐人寻味。毛主席指出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个基本原则,拍科教影片时同样要遵循。科教影片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论文,它是政治与科学、科学与艺术的辩证的统一。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就不能拍出好的科教影片。”

有分析,有总结,才会有进步。有关部门要不断总结拍摄科教影片的经验。要相信群众,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共同拍好科教影片。只要我们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果,排除“左”右的干扰,吸收和借鉴以前拍摄的科教影片的某些长处,勇于实践,敢于创造,深入到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就一定能拍出更多更好的科教影片来!



· 杂 文 ·

在“反酗酒”的背后

阳 戈

人们知道，今天的美国，随着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化，它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严重。在“美国生活方式”的腐蚀下，吸毒者越来越多，每年仅用于吸海洛因毒品的费用就达三十亿至一百亿美元。但是，类似的社会危机在现今的世界上并不是绝无仅有。今天的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统治下，酗酒现象与美国的吸毒现象相比绝无逊色。据统计，苏联每年仅喝伏特加酒就花掉一百三十亿卢布；全国每年竟有六、七百万人进“醒酒所”。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号称世界上“文明的富国”，可是“文明”却带来了吸毒成灾；另一个自诩用“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第一次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然而竟“发达”得酗酒成风，真是无独有偶，堪称两绝。

今年六月中旬以来，苏修在国内发动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反酗酒运动”。苏修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同酗酒和酒癖作斗争的措施”的决定，责成全国上下加强反酒癖的宣传，要求缩减和限制一切烈性酒的生产 and 供应，减少酒店和卖酒时间，等等。接着，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规定对酗酒、引诱未成年人饮酒、私自酿酒、酒醉开车等项的具体罚款条例，重者甚至要“剥夺自由三年至五年”。于是报刊、电台、电视、电影就紧密配合，又是公布法律，又是展开讨论，许多头面人物也出来写文章，做演讲，一时间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酗酒，这本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严重问题。但象现在这样，把酗酒看作是比瘟疫还可怕的“敌人”和“魔鬼”，从中央到地方，兴师动众，倾巢而出，大反特反，则不仅是苏联历史上罕见的“运动”，也是世界历史上绝妙的奇闻。



奇就奇在：苏修统治集团在大声疾呼反对酗酒的同时，却绝口不提产生这种社会危机的阶级根源。在讲到反酗酒的措施时，那是不厌其详，甚至连哪些酒店和食堂每天从几时到几时只准出售多高度数的酒精饮料，也都开列出来。谈到酗酒的危害性时，也可说是做到了耸人听闻，什么引起“道德堕落”啦，造成事故和死亡啦，生产率下降和废品率上升啦，等等。《真理报》总结了一条“经验”说，事情就是“从一杯伏特加酒开始走上违法乱纪的邪路”！有一家报纸干脆宣布：“酗酒——恶中之恶”。很明显，他们是想把由于复辟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切恶果统统都归咎于酗酒。但是，人民群众不禁要问，究竟人们为什么要酗酒呢？酗酒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大大小小的报纸发表的那么许许多多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由此可见他们的“坦率”程度是极其有限的，搔到痒处的时候就大声鼓噪，触到痛处的问题便讳莫如深了。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在吃人的剥削制度下，难以糊口的劳动群众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去酗酒。为列宁所赞扬的高尔基的小说《母亲》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不会喝酒的青年工人巴威尔，在他没有成为自觉的革命者之前，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听到了母亲的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你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

“大家都喝酒……”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他说的不错。她自己也知道，除出酒店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消遣的地方。……

这段朴素的描写表明，工人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正是由于感到没有出路而极端苦闷时才用喝酒来麻醉自己。在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他们看到的丑恶和污秽太多了，他们受到的辛酸和苦难太重了，他们以为，喝醉以后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自己生活的困窘和忧愁，但实际效果却是“以酒浇愁愁更愁”：因为酗酒只能破坏工人的健康，只能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并引起某些家庭纠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用大量的材料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种必然现象”，并且强调指出：“既然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够责备他呢？”“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负责的是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对象的人。”这就告诉我们，酗酒的



根源是剥削制度本身。要消灭酗酒，就必须首先消灭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倒那些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

苏修统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承认造成今天苏联人民群众中普遍酗酒的阶级根源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群众中的酗酒现象反映了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群众的不满情绪是随着苏修政治上的法西斯高压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一天一天地在增长起来，如果承认了这个症结所在，岂不等于要了他们这班先生们的命吗？他们岂止不敢承认，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这个问题呢。

《消息报》特地刊登了苏联第一副总检察长就酗酒问题答该报记者问，标题叫做《为了社会，为了人的利益》，他说：“酗酒这种社会祸害是统治阶级、特别是沙皇政府几百年养成的”，它成了一种“传统习惯”。这位检察长先生想把酗酒问题的责任一古脑儿都推到老沙皇身上，这番苦心是不言而喻的，可惜，他越想为新沙皇补漏洞、打掩护，却越露出漏洞来。人们不禁要问：老沙皇寿终正寝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为什么酗酒现象至今有增无减？难道躺在坟墓里的老沙皇还能直接制造“酗酒这种社会祸害”吗？至于说酗酒完全是沙皇时代旧习俗的影响，那么请问，为什么时至今天酗酒现象会越演越烈，以致在大吹大擂“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发达”到要发动一个“运动”呢？原因很清楚，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之一。

这位副总检察长先生还说：沙皇“不仅从这方面捞到巨大的国库收入，而且主要的是，用酒精来麻痹工人和农民，使他们失去阶级自觉性和脱离争取权利的斗争”。这真叫不打自招。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用来说明今天的苏修统治集团，不是恰如其分的吗？按照有些文章的说法，酗酒既然是万恶之源，那么，只要把酒厂、酒店统统关闭掉，岂不可以杜绝一切“违法乱纪的邪路”了吗？可是，苏修统治集团决不会这样干，原因是，大兴酒业对于维护其反动统治大有好处。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苏联烈性酒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左右。酒的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快三倍。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文化腐蚀人民群众的思想；一方面又施展高压手段，动辄把人关入“精神病院”；与此相济的还有一手，就是用酒精毒害人民，麻痹人民的斗志。

不过，新沙皇大兴酒业之后，事情就走向反面了。由于酗酒的普遍蔓延，大量的旷工现象和刑事案件就接踵而来，而更主要的是，人们可以借醉酒的机会发



泄一下积压在心中的政治怨愤。前年，苏联内务部的一个副部长就大叫大嚷酗酒造成了“无视现行法律”。事到如今，这“一大祸害”已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所以非得新沙皇亲自出来下“禁酒令”不可。新沙皇虽然想从大办酒业中多捞点外快，但一看酗酒泛滥成灾，发现了“一杯伏特加酒”可以启发人们去大发牢骚，以至使现存的社会制度陷于更加不稳，权衡之下，感到得不偿失，因而就破口大骂酗酒是“恶中之恶”了——这就是从大兴酒业到大反酗酒的来龙去脉。

苏修叛徒集团很明白，苏联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情绪是防不胜防的，但为了保护其反动统治却又不得不防。新沙皇“防民之口”的办法真可谓花样百出，不仅把人民的各种社会主义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而且还通过“反酗酒”把群众喝酒的时间、地点以及酒的度数都规定得死死的，以免人们“酒后失言”。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万无一失，把人民之口完全封住了。这一道道的“禁酒令”真有这样灵吗？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不得不承认：“最正确的立法条令本身不能消除酗酒和酒癖。”还有那位可爱的第一副总检察长先生也哀叹道：“仅凭一纸禁令是不能解决这一任务的。”其实，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无视现行法律”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社会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就是为了保证特权阶级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强迫广大劳动群众听任这一小撮人榨取他们的脂膏。既然劳动群众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的敌视和迫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制度呢？“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防范的花样都是徒劳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真理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那些有饮酒嗜好的劳动者往往是想要反抗而尚未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的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阶级斗争的觉悟是会逐步提高的。那时候，他们就会从反动统治者的酒精毒害中觉醒过来，投身于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制度的伟大斗争。目前，苏联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如地下的火焰一样正在到处冒出来，吓得苏修统治集团手忙脚乱，“反酗酒运动”正是反映了他们这种虚弱的阶级本质。经过十月革命锻炼的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从这个“反酗酒运动”的奇闻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奇闻制造者们的命运则是很不美妙的。

